

台州史志

2021年第2期

(总第90期)

《台州史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欠梅

副主任:林明达 许宏志 刘东生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康 王有浙 方先勇

冯建胜 阮士标 张树荣

陈长有 陈成叶 陈青鸿

陈献之 罗海军 袁义忠

主 编:刘东生

副主编:郑秉威 陶 毓

编 辑:王赞赞

地 址:台州市行政大楼1604室

电 话:0576-88510609

邮 编:318000

E-mail:tzds@zjds.org.cn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印 刷:台州市机关印刷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台州市地方志编纂室)

台 州 市 党 史 学 会

目 录

卷首语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3

百年辉煌

台州百年党史概述 吕永飞 4

党史故事

潘心元与红十三军第二团（师）的故事（上） 李兆建 10

战地百合分外香

——纪念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院长吴合 徐 平 19

党领导下的黄岩茅畲妇女运动

——台州杰出革命女性代表 王 康 25

难忘的记忆 不朽的丰碑

——追忆台州革命斗争中的三位老共产党员 郑普顺 张善相 31

从战火中冲出的人民公仆

——林浪传略 李幸斐 37

党史论坛

百年“红船精神”在台州大地绽放光芒 罗灵英 42

黄岩区“五位一体”数字化驱动党史学教唯实惟先 陈献之 50

人文台州

从“台州式的硬气”到“黄泥墙精神”：地域文化传承与地方革命精神塑造的
仙居样本 朱 成 53

简讯

台州市庆祝建党百年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暨“百年初心·幸福台州”大型网
络传播活动启动 61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学党史·践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61

椒江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 62

三门县建立“党史夜校”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载体 64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井冈山上，坚定的共产党人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红旗下，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在宝塔山下，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回望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要深刻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在这个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停留、迟疑、观望，必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一鼓作气、继续奋斗。越是接近奋斗目标、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全党同志要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一百年来，革命精神如火炬，又如明灯，始终照亮前行的道路，激荡起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伟大力量，推动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从一艘小小红船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展望未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党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节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台州百年党史概述

吕永飞

百年党史，台州大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台州始终以先行的姿态在浙江“红色根脉”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台州是浙江红色革命的先发地。早在1919年，陈宏勋、周炳琳、牟正非、孙德忠等台州籍爱国学生在北京组织策划、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奋战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线。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台州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于1924年春成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台州革命的序幕。随后，在上海、北京、南京、宁波等地入党的部分台州籍共产党员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至1927年春，临海、黄岩、温岭、宁海等地党的组织建立，并帮助国民党要员筹建和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推进国共合作，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包定、陈祥

等革命先烈响应“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武装农民发动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革命委员会，被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此后，天台、临海、仙居、黄岩、温岭、玉环等县的党组织，相继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安民军”等农民武装组织。1930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台州各地农民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1932年5月，红十三军主力斗争受挫，军部解体。红军在台州的余部，利用山区、海岛的有利地形，顽强战斗至1936年。在长达八九年的艰苦斗争中，台州有300多名红军（含全体大队长以上的红军干部）英勇牺牲。武装斗争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此后台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抗日战争时期，台州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战时工作队等组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动员大批爱国青年，组成志愿兵团（队）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党组织在山区建立抗日武装工作基地，黄岩桐树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高山上的坚强战斗堡垒”红旗11年不倒的传奇。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台属党组织从隐蔽精干斗争，逐渐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1947年初，台属地区被确定为浙东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建立。同年10月，在三门县南田（今属象山县）发动了“南田缴枪”，建立了台工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后称“铁流部队”）。至1948年下半年，党组织已遍及台州各地，并将统战工作深入到国民党县政府内部。1949年2月17日，三门县解放，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解放的县。4月至7月，玉环、天台、温岭、临海、黄岩、仙居等台州内陆地区相继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台州取得重大胜利。1955年，随着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沿海岛屿的解放，台州全境宣告解放。其中，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的联合作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台州是大陈岛垦荒精神诞生地。1949年6月5日，根据浙江省委决定，撤

销中共台属工委，建立中共临海地方委员会（7月改称中共浙江省第六地方委员会）。6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电令，成立浙江省第六区专员公署，下辖7县2直属区。中共台州地委、专署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台州政权的建立。

为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党领导台州人民，一方面开展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斗争，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台州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达2.38亿元，比1949年增长46.91%。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全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这些都为台州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3年起，全党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迈进。台州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领导全区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12月，台州各县“三大改造”相继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台州建立起来，实现了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台州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台州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这十年之初，台州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浙江省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台州实际，通过因地制宜开展经济建设、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施“一五”计划、“整风反右”等，社会主义事业在台州有了一个好开端。后来，虽然遭受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等重大挫折，但这十年间仍然取得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台州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十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一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台州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均有大幅增长。二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机械、引进和选育良种、改革耕种制度等，台州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1964年，台州全区粮食亩产平均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三是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至1965年，全区有食品、纺织、机械、电力、医

药、化学、造纸、皮革塑料、建材、造船、工艺美术等数十个行业。以机械、电力、工艺美术、化工医药、食品制造、轻纺服装为主体，包括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具有台州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渐成雏形。四是水利建设成果丰硕。台州人民广泛开展兴修水库、疏浚河道、建闸筑坝、围海造田等水利建设，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五是社会事业稳步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在多次调整中得到发展，且用于发展这些事业的财政支出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台州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并从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一时期兴办的一批中小企业和投资建成的基础设施、基础项目等，为此后台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月至1960年7月，台州、温州等地先后5批467名青年，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召，登上大陈岛垦荒，用青春和汗水将满目疮痍的荒岛变为“东海明珠”，铸就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成为台州广大干部群众永恒的精神丰碑、不竭的力量之源。60多年来，大陈岛先后受到胡耀邦、习近平这两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其中，习近平总书

记“一次登岛、两次回信”，强调要继承和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加快建设“两个大陈”，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开展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时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在台州兴起后，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一度瘫痪，运转异常，各类武斗和恶性事件频发，“打砸抢”成风，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动乱之中，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难以维持。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内，台州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凭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凭着人类的良知，忍辱负重、排除阻力，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在各条战线上坚持生产和工作，艰难地推动台州向前发展。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台州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新旧冲突、徘徊前进是两大特点。一方面，全党指导思想没有彻底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旧的和制度和制度仍然禁锢着台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另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台州全区在思想组织上开始了初步的拨乱反正，促使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一定发展。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台州是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市场经济先发地。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台州人民最早觉醒、最早响应、最早创业，突破体制机制束缚，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开启了台州崛起之路，使台州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台州现象”。其间，全国第一批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第一家经工商注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支持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政策文件、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第一条民资控股高铁等多项“全国第一”均在台州诞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台州34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是台州改革开放起步，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阶段。这一时期，解决历史性问题与迈出探索性步伐相交织。台州各地普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与补课，开展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台州的改革在农村起步，发展重点是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合实际，台州地委提出“抓两翼（即多种经营与社队企业）、促主体（即粮食生产）”的发展思路，单一集体所有制主体逐

步向多元化经营主体转型。台州各县利用山、水、滩、涂等建设各种商品基地，创办一批社队企业，大力发展加工工业，走上了农工副、农工商综合发展道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这为台州以后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

（二）1982年9月至1991年12月，是台州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发展路径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台州地委适时提出要大兴山海之利，组织实施“三大开发”，大力发展“两水一加”“两建一出”以及拆旧利废，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为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与开发性生产规模的扩大，台州地委因势利导地作出了有利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战略决策。各类专业市场的兴起，有力促进了台州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台州地方党委政府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争论、不压制、不张扬，股份合作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县域经济、外向型经济初露端倪。此外，城市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全面展开。通过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以及对国有小企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等，经济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激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撤销，乡镇基层政权组织恢

复。

（三）1992年1月至2002年10月，是台州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实现撤地建市并部署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台州各级党委、政府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要求，深化市场取向改革，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发展民办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提炼“台州精神”等系列举措，使台州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其间，经国务院批准，台州于1994年实现撤地设市，开始迈入建设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发展格局。同时，市委加深了对台州区域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台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腾飞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实施三大工程、加快三大转变，实现二次腾飞”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现代化港口大城市的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四）2002年11月至2012年10月，是台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这一时期，台州市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的“八八战略”决策部署，提出打造“三张名片”、建设“三个台州”、实施“四大战略”等战略思想，并抓

好推进落实工作，探索具有台州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民营经济走上了转型升级与改革创新的道路。抢抓海洋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实施主攻沿海战略。通过大项目引进、大平台建设等，合力共建中心城市。注重统筹兼顾，着力改善民生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面貌明显提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生态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文化强市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扎实有序推进。其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前后15次莅临台州考察调研，足迹遍布每一个县（市、区），在民营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基层治理、防台工作、作风建设、班子建设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台州的改革发展把脉定向、提振信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台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是台州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并开启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浙江省委决策部署，台州坚持“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奋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谱写了“两个高水平”的

新篇章。台州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关键领域短板等“三大历史任务”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赋能现代产业、科技新长征、大湾区建设、新时代美丽台州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清廉台州建设等方面均获得有力推进。

2020年，在交出疫情防控高分报表的同时，“十三五”顺利收官，全市生产总值跃上5000亿元台阶，人均生产总值步入高收入阶段，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2021年1月召开的台州市五届五次党代会，深入谋划“十四五”时期台州发展思路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以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为战略牵引，以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为总目标，以“三立三进三突围”为发展路径，推进台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开局起步。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处处长）

潘心元与红十三军第二团（师）的故事（上）

李兆建

1986年，中共玉环县委党史办在寻找红十三军的相关史料时了解到，在玉环苔山岛上有一座无名的红十三军烈士墓。据苔山岛上的老人们回忆，这位红十三军烈士是湖南人，当时大家都叫他潘先生，在苔山岛上住过。他在去温州的途中，被敌人枪杀于芦浦。他牺牲后，红十三军战士从玉环的分水山抢回遗体，安葬在苔山岛上最高的地方。

1995年9月，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视下，经过省、市、县三级党史部门的调查考证，最终认定这位牺牲在玉环县芦浦的潘先生，就是红十三军政委潘心元烈士。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委副书记刘枫都作出批示，同意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报告，认定潘心元在1930年8月和10月先后两次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浙南从事革命活动，任务是整顿和发展红十三军队伍；潘心元曾任红十三军政治委员，1930年冬，在玉环九眼江（港）遭遇

敌人而英勇牺牲。

潘心元是党史重要人物和全国著名革命烈士，是牺牲在台州的红军最高级别领导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秋收起义，历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常委、红三军代政委、红四军政委、红十三军政委等重要职务。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光彩永照人间。

一、首任浏阳县委书记

潘心元，又名潘心殷、潘心源、彭西原、彭清泉等，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团伍家渡的一户地主家庭。潘家是浏阳北乡一带有名的富户，有良田三百多亩。他的舅舅也是浏阳乌龙团的豪绅，由其出资开办了一所学校，当时七岁的潘心元就在这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潘心元在读小学三年级时结识了

转学过来的班上同学田波扬。两人志趣相近，意气相投，都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莫逆之交。1917年，潘心元受双方父母包办，与北盛团首富之女、大他四岁的周坤元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周坤元此后也一直支持着潘心元的革命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风云激荡，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强烈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格局。在湖南，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湘江评论》，遭到反动当局查封后，又创办了《新湖南》。这个时候，潘心元的心中产生了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念。他邀请好友田波扬等人前往长沙报考。1920年，潘心元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他眼界大开，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2年春，潘心元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潘心元由田波扬、夏明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心元在长沙读书时刻苦好学，学业大进，又善于辩论，同学都称他为“博士”。他为人刚正，疏财仗义，很快赢得大家的信赖。潘心元平时最喜欢去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筹办的文化书社，在那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马列书籍，思想得到了升华。之后，他召集田波扬等同学，仿效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的做法，成立了浏北新民社；潘心元

担任负责人，并集资出版《新民》刊物。《新民》创刊号上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登载了湖南一师学生郭亮撰写的诗歌《列宁记》。由此可见，年纪不大的潘心元具有很大的胆识。潘心元自己也撰写了《打妖》《乡村革命与新旧调和》等文章，针砭时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郭亮，并由他介绍拜访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和郭亮的帮助下，潘心元把《新民》办得更加出色。

1923年寒假，潘心元回到家乡伍家渡后，举办农民夜校，村里的农民纷纷前来听课。他借此开展革命思想的宣传，讲述团结起来推翻封建压迫和反帝反军阀的道理。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比较缺乏。潘心元便想方设法让家里出钱：他向老乡筹款，然后开出借条，让借钱的老乡拿着借条向他母亲要钱。潘心元的母亲见是宝贝儿子写的借款字据，无可奈何只得认账兑付。其时，王震在长沙做工，潘心元便借用王震的工钱做党的经费开支，并写了借条让王震到乡下潘家找他母亲去挑谷还账。

1925年初，潘心元学成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和田波扬一起回到家乡浏阳，协助夏明翰发展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他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发展党员，并建立了中共浏阳特别支部。5月，在潘心元的领导下，建立了浏阳

第一个农民协会——乌龙团农民协会。当时，浏阳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潘心元领导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阻止粮食外运和开仓平糶等斗争。他动员自己母亲和岳父核减佃户的租息，主动将家里谷仓的粮食分发给附近缺粮的农民。这样，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农民纷纷靠拢共产党，加入农民协会，参加救荒斗争。数月时间，农会会员发展到两万余人，并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同时，在北盛团的手工业工人中建立了工会。潘心元指示安源煤矿回乡矿工、共产党员周克明在北盛区建立区总工会，这是浏阳最早的工会团体。

1926年4月，潘心元到长沙出席湖南省全省党的工作会议。他向湖南省委汇报了浏阳党组织发展和工农运动情况，听取省委负责人郭亮、夏明翰关于进一步发展农运的指示。回到浏阳后，潘心元着手筹备公开成立北盛团农民协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他主持召开北盛团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随后，农民协会带领农民群众砸开地主土豪粮仓，给青黄不接的贫苦农民发放粮食，土豪劣绅吓得纷纷外逃。7月11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驻长沙。潘心元在浏阳县城成立浏阳各界欢迎北伐军筹备处，组织当地群众欢迎北伐军。7月26日，浏阳人民扎彩楼、放鞭炮，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叶

挺独立团进入浏阳休整。北伐军进入县城前，潘心元率浏阳各界代表在五里外迎接，并在县城召开盛况空前的联欢大会。叶挺、林伯渠等先后在大会上致词，感谢浏阳人民的欢迎，并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北伐军。北伐军在浏阳驻扎了半个月，潘心元日夜奔忙，发动群众为部队当向导、运输粮草、慰问将士，并请北伐军帮助训练农民自卫队武装。他亲自送二百名农会骨干到叶挺独立团参军。北伐军也派出党团干部组成宣传队，给浏阳各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浏阳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

北伐军离开浏阳后，潘心元着手筹建浏阳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并在狮山书院举办政治讲习班，培训工农运动骨干。8月12日，浏阳县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浏阳县总工会，并组建工人纠察队。9月初，浏阳县在县城文庙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会，全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规模居湖南省首位。自此，浏阳工人武装与农民自卫队相互配合，成为浏阳革命运动的柱石。之后，潘心元到长沙向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汇报筹备建立中共浏阳县委的情况。李维汉听后认为浏阳的工作扎实，条件成熟，表示同意。1926年10月5日至8日，中共浏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城北龙盘岭下的文庙大成殿（今浏阳市博物馆）召

开，浏阳各区党员代表 96 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县 22 个支部、516 名党员。大会由潘心元主持，中共湘区委代表龚际飞致贺词。次日，大会举行选举，推选潘心元、张侃、张启魁等七人组成中共浏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潘心元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共浏阳县委的正式成立，揭开了浏阳革命的新一页。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也日益疯狂。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土豪和民团武装开始反扑。浏阳县官渡党支部书记张炳南竟遭敌人杀害。潘心元意识到浏阳全县各地有个团防局、600 余支枪，这是一股潜在的威胁势力，必须想办法尽快地除掉这一心腹之患。1927 年 1 月，他召集县委会议，商量建立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浏阳县工农义勇军，决定改造县警务队并夺取团防局枪支。会后，潘心元派宋任穷、王首道、张启龙、张侃、周克明到各区团防局做分化瓦解工作。2 月 4 日，他利用正月初二浏阳吃春酒的习俗在县城摆下宴席，邀请各地团防局的团总赴宴。席间，县农民协会会长起身致词说：“当今革命法规规定，一切权力归农会。借今天的宴会，我代表县农会正式通知各位，所有团防武装枪支和经费，一律缴归农会。否则，后果自负。”团总们一听，目瞪口呆，早已坐立不安。当他们看到宴席外面已经站满手持梭

镖大刀的农民自卫队队员时，知道大势已去，只好老老实实地报出各个团防局的枪支、弹药和经费数目，听由农会收缴。县委立即派出骨干动手收缴了团防局枪支 670 余支，快枪 200 余支，机枪两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浏阳工农义勇军，潘心元任党代表。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培训农民革命武装力量，为此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浏阳后，县委和各界群众团体发出讨蒋通电。4 月 27 日，潘心元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等提出的武装工农主张。他在会上表示：“我们应该积极准备自己的武装。”“如在主观力量可能时，应举行两湖暴动。”潘心元是较早提出以革命的武装暴动反抗反革命武装主张的党代表，也是党内较早从事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工作的领导之一。由于当时会上充满机会主义思潮，他的主张被弃之一边。5 月 10 日，潘心元日夜兼程从武汉赶回浏阳，并立即派出骨干到四乡发展农民自卫队，同时狠抓工农义勇军的军事训练。

1927 年 5 月 21 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省总工会、省农会，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惨遭杀害，致使湖南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

中。潘心元对妻子说：“我的头是钢铁铸的，对革命是至死不移的。”“革命不成功，我是誓不罢休的。”他主持召开中共浏阳县委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进攻长沙向许克祥讨还血债的决议。会后，县委成员分头行动，一面召集工农义勇军进行战斗准备，一面联络平江、醴陵等地党组织和农民自卫队。5月27日，湖南省委秘密会议决定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28日，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通知湘潭、醴陵、浏阳的农军，定于5月31日拂晓围攻长沙。潘心元接到指示后立即部署攻城事项。29日，他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和编队；下午，与苏先骏等率领的工农义勇军汇合后，兵分两路向长沙进发，并于5月31日早上赶到近郊。中午十一时半，浏阳义勇军率先发起攻击，分别向敌军驻守的南门口和陆军医院进攻。这时，湘潭、湘乡、醴陵、宁乡等地的农军也集结在易家湾一带。省工人纠察队及河西农军赶到岳麓山后，各路队伍已经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据守在长沙城内的许克祥开始恐慌，发急电求救：“日夕数惊，守兵殊倦，各县告急，无力援助，形势如斯，焦急万分”。

在此关键时刻，时任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以右倾投降主义作出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错误决定，派出谭平山到长沙调解，并派李维汉通知

各地农军停止进攻。各县农军纷纷撤离阵地。面对这一情况，潘心元不得不指挥浏阳农军撤退。6月6日，田波扬等人在长沙英勇牺牲，消息传来，让潘心元十分悲痛。

围攻长沙失败之后，许克祥指挥反动军队加紧清乡剿共，残酷杀害工农干部。7月6日，湖南省委派夏明翰从长沙赶到浏阳通知潘心元等人，长沙国民党部队已派出重兵进剿浏阳。为了保存实力，浏阳义勇军撤出浏阳县城，退往平江。潘心元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服从省委领导，率领浏阳工农义勇军撤至平江长寿街暂驻。

二、秋收起义前智救毛泽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此时，潘心元正准备赶往武汉，向党中央请示工作。7月中旬，他在前往武汉途中遇到了从汉口赶回长沙

的苏先骏。苏先骏告诉潘心元，已经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两人立即一道回到平江。在长寿街，他们与平江县委负责人召开会议，苏先骏传达中央指示：“平、浏工农义勇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由苏先骏率领开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在会上，苏先骏与平江工农义勇队队长余贲民为争当独立团团团长而发生争执，导致两队无法合编，延误了时间。直到7月底，浏阳、平江两支武装按照各自编制一道往南昌进发，到达武宁时南昌起义已经打响。8月5日，他们获悉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的情报后，准备后撤。然而在讨论部队去向时，苏先骏同余贲民又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分开行动：平江工农义勇队返回修水边界，浏阳工农义勇军追赶南昌起义部队。这样一来，部队士气受挫。8月9日，潘心元召开浏阳部队党员干部会议，整顿思想。他对苏先骏的个人英雄主义、争当团长、独断专行的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

正在部队讨论下一步方向时，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派人找到了潘心元。于是，潘心元决定让部队前往铜鼓与余洒度部联络，自己去安源找湖南省委汇报请示。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毛泽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

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夺取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开赴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进军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不久，平江工农义勇队也到达修水县城。这样，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已经分头集结。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屯兵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浏阳工农义勇军于8月20日抵达铜鼓。8月22日，三支部队负责人在修水山口举行整编会议（史称“山口会议”）。会议决定，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师部设修水县城，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设第一团、第三团，钟文璋兼任第一团团团长，苏先骏任第三团团团长。“山口会议”的整编决定，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雏形。

8月底，潘心元抵达安源，与中共安源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了两支队伍的情况。安源党组织立即派人向省委报告。8月31日，毛泽东也到达安源，随即召开党的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会上，毛泽东请潘心元介绍部

队的情况。潘心元详细汇报了自己所了解到的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军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对秋收起义的力量有了全面了解。

次日，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具体军事部署。潘心元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这个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原第一团、第三团建制不变，将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由王兴亚任团长；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5000人。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潘心元兼任第三团党代表。会议决定，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分三路进攻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告诉潘心元：他准备和潘心元一起赴铜鼓，直接参加第三团的工作。

9月5日，周克明和刘建中从铜鼓赶到安源，承担护送毛泽东和潘心元去第三团的任务。为了保证路上的安全，周克明、刘建中装扮成小贩，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毛泽东和潘心元打扮成富商紧随其后。就这样，他们四人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不料，半路上遭遇了敌人，毛泽东差点被捕。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突遭被捕危险。因此，九年之后，毛泽

东在延安面对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专门谈到了这个情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也详细记述了秋收起义前这段惊险的一幕。书中这样写道：

“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后者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安源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常有大批共产党员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用它贿赂押送我的人放掉我。那些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的兵，我遭到枪毙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特别好处，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那个负责的队长不肯答应。于

是我决定逃跑。但是一直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逃到一块高地，下面有一个池塘，四周长了很高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几个农民帮他们一同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不再搜寻了。我马上爬越山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子，脚也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对我很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吃的东西。当我最后安全地抵达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毛泽东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十分清楚：那个与毛泽东同行并“借给”几十元钱的同志就是潘心元。具体情节是：由于周克明和刘建中走得太快，在岔路口留下的路标被大风吹走，毛泽东和潘心元走错路，与周、刘走散了。走着、走着，他俩突然遭遇到一伙民团团丁，被拦住盘问起来。团丁们要把毛泽东和潘心元押到民团总部去。在这危急关头，潘心元急中生智，将自己身上携带的银元、金戒子

抖落在地上。这些团丁见钱眼开，连忙抢着去地上捡拾。潘心元假装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声称要向民团总部的团总告状，便疾步扬长而去。他用眼色暗示毛泽东借机脱身。毛泽东心里早已经明白潘心元的意图。那伙团丁见潘心元走得快没人影了，拔腿就追。毛泽东则在原地磨磨蹭蹭的，仅剩下三个团丁看守他。毛泽东见机会来了，便和三个团丁聊天套近乎，随后又掏出一把银元犒劳，每人一份。这三个团丁信以为真，将毛泽东视为一个慷慨大方的做生意老板；现在又得了这位老板的好处，也就不再为难他。毛泽东趁机脱身，逃到一处山上的水塘边躲藏起来。直到天黑，敌人搜寻无果，气急败坏地撤走了。毛泽东这才往铜鼓方向赶路，并于第二天晚上赶到铜鼓县城，受到了周克明和起义部队的热烈欢迎。就这样，在潘心元的机智掩护下，毛泽东安然脱险。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发，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农民自卫队缺乏作战经验，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部队严重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团、第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京剧《杜鹃山》中雷刚的原型）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毛泽东脱险之后的当天，潘心元被敌人带到了民团总部。潘心元见到那些民团头目，大声嚷嚷说，你们连做生意的人也抓，以后还有谁敢到你们这里做生意。民团头目听他是浏阳北乡口音，后又从他身上搜出钱和几张单据，一时也搞不清底细，于是决定将他押送县城，由民团总局发落。就在次日被押往县城途中，潘心元趁机逃脱了。

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元留在平江、浏阳、醴陵地区组建游击队。他与平浏醴特委书记夏明翰一起组织开展游击斗争。1928年1月，

潘心元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他率领浏北游击队、浏东游击队和高坪游击队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斗争，组织黄金洞工人暴动，袭击铁山、张坊等地民团武装，给敌人以狠狠打击。7月，潘心元带领游击队支持彭德怀、滕代远等率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等部举行平江起义。7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调集十多个团进行“围剿”。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上井冈山。8月底，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进发，但在途中遭到敌鲁涤平部的袭击而受阻。10月，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主力部队与平江、浏阳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其中三个纵队由黄公略统率，留在平江、浏阳地区继续打游击，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军部和两个纵队奔赴井冈山。12月11日，红五军终于到达井冈山根据地宁冈县，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潘心元没有随红五军上井冈山，而是和王首道等一起在浏阳、铜鼓、平江、修水一带领导革命运动，顽强坚持斗争。同年冬，潘心元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

战地百合分外香

纪念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院长吴合

徐 平

最近，我多次来到位于天台县石梁镇的后方医院遗址，寻访红色足迹、重温红色故事，期待更多的人记住为解放战争立下大功的女白衣战士——吴合。

1948年12月，为做好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上海医学院刚毕业的吴合同志被派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任院长。她的事迹，被简单地记载在《中共天台地方史》一书中。然而，解放后，再无吴合的音讯。

10年前，我参与整理革命史料，经多方查找，终于在陕西省友谊医院的网上信息里“找到”吴合。2012年12月，我与吴合及其子女朱建军、朱建平兄妹俩建立了联系。之后，吴合经常来电询问天台革命老区的情况，并陆续寄给我许多文字及图片等历史

资料。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将吴合的资料作了整理。吴合如其名：她就像一朵圣洁的百合花，绽放在弥漫着硝烟的战地上。我相信，这朵曾奋战在天台山的战地百合，一定能让后人在她的光辉历程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进入后方医院的吴合

从“大家闺秀”到革命志士

吴合是河北滦县人，原名吴秀贞，曾用名吴经，出生于1924年1月，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父亲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潘悉文尼亚医科大学，曾任河北医学院教授；母亲是天津女校校长。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吴合，早早就受到了革命的影响。1942年10月，吴合考入上海医学院（现为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部），194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进步学生读书会，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48年毕业时，吴合已在学校影响很大。因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搜捕，地下党组织便将她安排前往江苏金坛，到党组织主办的维文医疗职业学院担任教师。

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常与敌作战，时有官兵伤亡，急需医护人员。1948年12月，游击纵队多次向上级党组织要求分派医生；组织接到报告后，将刚安排到维文医疗职业学院的吴合派往后方医院应急。

据吴合同志回忆，在接到党组织通知后，很快就有一个女交通员上门

来带路。她和交通员都穿上老百姓衣服，两人装成不认识，从上海坐轮船到宁波；到宁波后又换了一个男交通员带路，顺利进入革命后方基地。

浙东游击纵队后方医院原设在天台山麓的宁海山洋村，20多岁的女大学生吴合成了新院长。数月后，攻打天台城战役打响，浙东临委为方便接收伤病员，决定将后方医院转至天台县北山外湖村一带。

同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朱一民，也被党组织派往后方医院，配合吴合工作；后来两人结为伴侣。在后方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最多时有14人。



吴合医学院毕业照



吴合夫妇合影

不畏艰苦自力更生

1949年3月2日，游击纵队第二次解放天台城，战斗中我方牺牲10人、负伤37人。伤员经东横岭头、欢岙，经一天奔波，直到3月3日深夜，才被全部抬至华峰外湖村。

吴合在朱一民的配合下，对伤员逐个进行清创、敷药等处理，足足干了四个小时。现场急救这一“仗”，让年轻的女院长名声大振。

刚处理完，山下的交通员送来情报，说有敌情。随后，伤员被迅速转往更加偏僻的山岙。此后好几天，几乎天天东村住一宿，西村蹲一夜。由于伤员多，医护人员少，常常从早到晚忙不过来。

吴合考虑到如此抬来抬去不是个

办法，便在东峰联络站站站长卓履冰建议下，利用下深坑竹林中村民春天煮笋的两座旧茅棚，建立临时后方医院。下深坑虽地处天（台）宁（海）新（昌）三县交界的边远山区，但附近有许多小山村，且有一条通往山寺的小路，易走漏消息。出于安全考虑，4月初，后方医院被转移。

这一次，后方医院被搬迁到人迹罕至的上深坑龙潭背的竹林深处，此处农民制作笋干留下的几间旧草房，成了掩护伤员的好地方，人称“竹林医院”。医院按照山势进行整修，编为一楼、二楼、三楼，重伤员与轻伤员被分开养伤。吴合因陋就简，在异常艰难的条件开展救治。

恰值冬春交接，深山的天气特别冷。尤其是夜晚，只有几条破棉絮的后方医院越发困难。如此境况下，吴合将从江苏带过来的几件毛线衣分给伤员防冻，自己则和医护人员用破棕衣、稻草来保暖，经常整夜冻得睡不着。她还将自制的竹床让给病人睡，自己与战友和衣打地铺。

医院缺少药物、器材，吴合就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担架、病床和固定骨折病人的夹板、镊子用竹子自制，

中草药上山采挖，饭锅被用来蒸煮消毒用品。没有热水瓶，吴合就用泥罐子放火炉膛里保温；没有止痛片，她就给伤员按摩穴位止痛。

重伤员的护理是后方医院管理的一个大难题。为让伤员能得到最及时的照顾，她干脆将地铺铺到重伤员中间。

吴合做实习医师时经常日夜照顾患者，培养了一种业务的特殊敏感性：就算已经睡着了，只要伤员叫一声“医生”她也能听到。有几次夜里重伤员要大便，正好身边缺人手，她使用双手拿树叶去接。

当时伤员中，骨伤的较多。吴合为骨折不能下地的伤员创造了一种竹竿小便器：她用火烙过的铁条将长竹竿中间的隔节打通，将竹竿一端放在伤员身边，另一端通到室外远处，极大地方便了伤员日常生活。

以身作则忘我工作

身为医生，吴合却将自己当战士来对待。为了让战友多些休息，她主动提出利用闲时参与站岗放哨。在巡逻中，吴合身上多处被树枝、荆棘划破或刺伤，她一直没有进行局

部处理和吃药，两条小腿和腰上的伤口都化了脓。

大家劝吴合服点抗菌药，她说药物太紧张，要优先给伤员。那阶段，后方医院和部队一起经常夜行军，极少在一个住处连住3个晚上。吴合当时穿的是一双连到膝盖的袜子，里面的伤口一直到结痂，她都没时间去搭理。药就在吴合身边的竹箩筐里，但她硬是舍不得吃一片，以至脚上留下了许多疤痕。

吴合性格温和，对于伤员特别理解，经常宽慰他们。一次，她给一个伤员换药，对方一时“吃痛”，就顺手拿起床前小使用的竹筒朝吴合头上砸。后来这位伤员公开道歉，主动要求“关禁闭”。吴合连连摇手，主动揽责任，说是自己换药时手劲没有拿捏好，加重了他的伤痛，请他原谅。吴合的反应，让伤员既惊喜又感动：



吴合后人在雕像前留影



天台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在龙潭背寻访竹林中的后方医院遗址

他发自内心感激组织关怀，在伤病好转后，第一时间重返了前线。

医术过硬的吴合，“观颜察色”有一手。一次，她在检查伤员时，发现其中一人呈现“苦笑貌”，便判断对方感染了破伤风，经检查果然如此。为挽救这位伤员的生命，她立即寻求破伤风抗毒素，使伤员脱离了险境。

在后方医院，技术力量缺乏，是吴合最头痛的问题。当时医院大多数人员没有经医药院校学习，难以派上大用场。她忙里偷闲，办起了业务培训班，自编简要课程，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讲课，内容有微生物和消毒观念、人体解剖、战地救护、药物，伤病治疗原则等。

吴合言传身教，加快学员成长。在教学打针时，她从不让学员在伤员

身上试针，而是将自己作标本，并让学员在她身上学换药。就这样手把手进行带教，后方医院的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尽管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但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没有发生一例感染和死亡，吴合曾带领医务人员圆满完成了解放天台城的伤病员抢救任务。

大爱济医风范长存

1949年6月，后方医院奉命出山进城，吴合被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台州军分区医疗队队长，后任宁波军分区医疗队队长、萧山35军104师建工6师医疗队队长。

1954年吴合随部队转业到陕西省建筑中心医院（后改为陕西省友谊医院），先后任内科主任、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副院长兼中华医学会西安医学会临床免疫学会副主委、中华陕西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会顾问委员、中华当代医学会副会长。

吴合在西北地区创办了首家免疫变态反应科，专长免疫变态反应疾病的诊治，先后接诊了3万多例患者。1979年2月，她光荣离休，但一直没有离开心爱的岗位。一直到2016年90多高龄时仍然坚守在诊治岗位上。



年迈的吴合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作报告

2019年7月27日零晨，吴合儿子朱建军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告知其母亲于7月26日10时28分不幸离世。我不禁热泪盈眶、悲痛万分，当即以天台县新四军研究会名义委托朱建军向吴合同志送上一个花圈，以表哀思。朱建军转告其母生前遗嘱：重病时不要插管，安静离去；身后之事一切从简，不要送花圈，不要买寿衣；丧葬费用捐给陕西失学儿童；遗体 and 眼角膜捐献给空军医科大学。

2020年5月19日，朱建军、朱建平兄妹俩从西安来到天台县，想在当年母亲战斗过的地方竖立一尊吴合雕像，此行来研讨落实方案。在参观县人民医院红色基因——吴合展览和院史展览后，他俩来到位于下深坑的后方医院红色教育基地，意外发现母亲

的塑像已落成，一时倍感激动。朱建军说，我们想要做的您们都做了，感谢天台县委县政府、感谢天台人民！

岁月如歌，一晃70多年过去了。天台的后方医院遗址，现在已成为一处红色教育基地。吴合在后方医院工作的事迹，成为天台革命传统教育的典范，为天台城解放增添了一个

动人的传说！

吴合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袁相月口述 徐平记录）

（作者单位：天台县传媒中心）

党领导下的黄岩茅畚妇女运动

——台州杰出革命女性代表

王 康

摘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台州的黄岩茅畚涌现出不少对革命有突出贡献的女党员、女战士。她们虽为女儿身，却巾帼不让须眉，用自己的行动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章益坚、章学英、牟仲娥、牟桂芳、林珂、牟菊明等6人皆为台州黄岩人，她们在茅畚小学林泗斋校长（中共党员）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章益坚与章学英两姐妹为抗战作出过较大贡献，被誉为“革命老妈妈”，牟仲娥、牟桂芳、林珂、牟菊明则被誉为“优秀女战士”。

关键词：党的领导 妇女运动 革命老妈妈 优秀女战士

一、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妇女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她们抗争、牺牲、奉献，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目标而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她们奉献了巾帼之力，唱响了巾帼之歌，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也是近代史上第一

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使中国妇女运动翻开了崭新一页。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妇女运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妇女运动实际，对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着更加充分、更有高度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之意义的论述既关注社会发展需要妇女参

与的一面，也考虑了妇女解放与发展需要社会参与的一面；既要求妇女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要求为促进妇女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下面以党领导下台州的黄岩茅畚妇女运动、台州6位杰出革命女性代表为例，论述党领导下的浙江百年妇女运动发展史。

二、台州的黄岩茅畚妇女运动中帼英雄

（一）“革命老妈妈”：章氏姐妹

①章益坚

章益坚是黄岩县万全乡江田村（今黄岩区澄江街道）人，原名章大妹。章益坚曾用过3个名字，其中2个是党组织帮她改的，她被群众亲切地誉为“革命老妈妈”。

1896年，时名章大妹的章益坚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她嫁到茅畚乡浦洋村。1935年，茅畚小学林泗斋校长带领一批教师，在离茅畚街一里路的浦洋村办起农民夜校，章大妹和妹妹、女儿一起参加了学习。

1938年上半年，林泗斋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给她改名章平东。1938年下半年，浦洋党支部分开设立男女支部，章平东担任女支部的书记，同时负责党的交通站工作。1938年底，黄岩党组织号召青年去皖南新四军工作、学习，章平东带头把自己刚满17岁的女儿牟仲娥送去参军。

1941年3月，黄岩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章平东奔赴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余姚梁弄，被分配在党的交通站工作。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见到她，鼓励她好好工作，并给她改名为章益坚。后来，她回到黄岩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48年，黄岩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剿共”，章益坚受到通缉，上级党组织将她转移到括苍支队活动的根据地。后来，她又回到当地工作，介绍不少青年去浙南游击队参加革命。

黄岩和平解放后，章益坚又回到茅畚浦洋，继续为党工作。她曾获评公社、区、县先进工作者，并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过浙江省共青团、省妇联代表大会。1981年3月，章益坚病故，享年85岁。

②章学英

章学英，原名章五妹。1906年，她出生于黄岩县万全乡江田村（今黄岩区澄江街道），后嫁到茅畚乡浦洋村牟家，1997年病逝。她与她姐姐章益坚一起，被誉为“革命老妈妈”。

1934年，林泗斋来到茅畚小学担任校长，同时开展革命活动。当年，章大妹、章五妹姐妹俩双双参加林泗斋办的浦洋妇女“午修班”学习。1938年，五妹在林泗斋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林泗斋还把她名字改为章学英。章学英一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协助胞姐章益坚做地下交通站工

作。1941年3月，中共黄岩县委被破坏后，她和一部分未暴露的党员潜伏下来，开展秘密活动，还以烟囱上冒出的“炊烟”为信号为游击队送情报。

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她智送双“○”信的故事。1948年，在姐姐章益坚转移到游击区后，她接任中共浦洋支部书记和茅畚党的交通联络站负责人。有一次，党组织有一封标有“○○”（“急件”的意思）的信，要送到王恩村蔡康春（时任永乐黄边区委常委）处。章学英就把信藏在菜篮底下横插着的宽竹签里，与12岁的侄儿小明一起，借口去给舅公奔丧，机智地与敌人巧妙周旋，冲破道道关卡，最终出色完成了任务。同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浙保四团100余人到章学英家搜捕。章学英在群众的掩护下，从后门逃出，爬过棺材底，躲在阴沟洞里，幸免于难。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黄岩茅畚发起规模较大的减租斗争，需要取得地主牟秉衡家的牟氏公堂租簿算账，章学英也顺利完成了任务。此次，仅茅畚街就减租谷2万多斤。后来各村参照茅畚街三七减租的做法，使整个黄岩茅畚共减掉租谷4万多斤。

新中国成立后，章学英担任浦洋村党支部书记、大礼乡党支部副书记、县人大代表等职，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二）优秀女战士

①牟仲娥

牟仲娥，黄岩县茅畚乡浦洋村人。1935年，茅畚小学校长林西斋和一批进步教师利用夜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她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母亲章益坚都成了夜校中的积极分子。

1938年春，牟仲娥与母亲章益坚（时名章大妹）、姨母章学英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她与陈庭槐、牟桂芳等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40年夏，党组织派她回到黄岩工作。1942年底，牟仲娥、蔡香奉命调往浙东游击纵队。牟仲娥开始被分配在司令部，后调到三支队搞民运工作。1943年，由纵队机关党委书记刘清扬介绍，她与三支队副支队长余龙贵结婚。1944年春，牟仲娥在宁波海曙的江口凤岙村一带活动。一天晚上，她带领七八个人偷偷拆毁敌人碉堡，使敌人在此再无立足之地。

1945年3月，余龙贵奉命调往浙南，担任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总队长，牟仲娥也相随前往。为了补充部队给养，她负责组织调动20多架缝纫机，动员80多个妇女，为部队日夜赶制服装，仅用七八天时间赶制，数百套服装和棉被加工完成，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来，牟仲娥因为临近分娩，无法随队流动，只得回家隐蔽。12月底，她在北洋后窑村分娩，产后不幸因病情恶化去世，年

仅25岁。

②牟桂芳

牟桂芳（后改名史易），1922年生于黄岩茅畚一户贫农家庭。1934年，牟桂芳在茅畚小学读书时，受到党的教育，懂得许多革命道理。1936年“西安事变”后，她积极参加茅畚小学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懂得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一致性，进一步坚定了参加抗日的决心。1938年底，年仅17岁的牟桂芳，与陈庭槐、牟瑞芝、牟彩云等一起北上皖南；到1939年初，找到新四军，被安排在后方医院。1940年底的一天夜里，部队护送皖南军部及一支队的后方机关过铁路线。这时，敌人探照灯突然亮了，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扫来，许多干部、战士倒下去了。当时牟桂芳冒着生命危险和其他医生一起，一趟趟爬过铁路，把伤员一个个背下来。这批伤员无法随队前进，部队当夜开紧急会议决定，要在天亮之前赶到长荡湖中藏好伤员。牟桂芳依靠革命群众，凭着坚定信念，在茫茫的芦苇荡中坚持了三个月，胜利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转移伤员任务。通过这次考验，牟桂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随部队北进受阻后，她奉命在日军围困的太湖长荡湖地区的芦苇荡里护理救治100多名伤病员，坚持艰苦奋斗半年多，其事迹后来成为电影《沙家浜》中卫生员小菱的素材来源。从芦

苇荡上岸时，正是“皖南事变”后不久，牟桂芳后任新四军十六旅后方医院材料科科长。后随军南下，直至福建龙岩。1952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中央卫生部工作，后又调河南、安徽工作。离休前，她曾是安徽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副主任。

③林珂

林珂是黄岩县新桥乡（今路桥区新桥街道）田际村人。小学时，她就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32年春，林珂进入田际小学读书。1933年，她跟随林泗斋转学保全小学。1934年下半年，林泗斋带着林珂等一批学生到茅畚小学。高小毕业后，她留茅畚小学当老师，组织一批不能上学的中青年妇女成立“读书会”开展自学活动。

在茅畚小学期间，林珂参加了林泗斋组建的茅畚小学“救国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出墙报，演节目，教儿童识字。她在上海《新儿童报》上曾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得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热情鼓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茅畚小学“救国会”成立半年以后，茅畚小学“儿童参观团”也诞生了。参观团的成员由学生自愿报名；报名十分踊跃，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最后只确定由林珂、牟端兰等7名学生组成。人员确定以后，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短期培训，准备好相关宣传资料，写好演讲

稿。参观团于1936年12月的一天出发，途经黄岩县城、海门、路桥、泽国，然后返回学校。

参观团在海门活动期间，适逢当地各界在大校场举行盛大的元旦庆祝活动，参观团也应邀参加。14岁的林珂年少志气高，从容登上主席台，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8年初，林珂到温州平阳的闽浙边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干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参加临海县政工队工作。1938年秋，她因身份暴露，返回黄岩，进入黄岩简易师范学校学习。1939年初，林珂回到田际，任教田际小学。1939年4月，她出席了在新桥蒋僧桥召开的全县党员代表会议。中共横街区委成立后，林珂任宣传委员。9月，她任中共黄岩县委妇女部长。1940年下半年，林珂到路桥“台州女子手工业指导人员养成所”学习，后加入《力行》剧团。1942年，她到仙居县朱溪小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林珂在浙江省工商联工作，后从事教育工作。

④ 牟菊明

牟菊明(1916—?)，又名牟决鸣，黄岩县茅畚街人。茅畚小学毕业后，她先后进入海门东山中学、上海爱国女校读书。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临海县政工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

年夏奔赴陕北，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鲁艺毕业后，牟菊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42年，她与著名诗人何其芳结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展和平谈判。牟菊明随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负责管理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后任董必武秘书。全国解放前夕，任中央高级党校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文化部和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三、新时期的妇女工作展望

(一) 台州黄岩妇女运动硕果累累

在党的领导下，台州黄岩的妇女运动蓬勃发展，黄岩妇女在运动中也得到全方面的锻炼。巾帼不让须眉，台州女子自古就充满智慧，同时也坚韧不拔。党的台州好女儿们充分表现了中华女子的才智、勇气和毅力。章益坚冒着危险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章学英智送双“0”信，牟仲娥勇拆碉堡，牟桂芳顶弹雨穿铁路背伤员，林珂大力宣传党和抗日救亡思想，牟菊明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在革命老妈妈和勇敢女战士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台州女子的血性和担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积极投身革命，在战场上为了理想和胜利冲锋陷阵，在地下战场用智

慧与敌人斗志斗勇。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党的好女儿们依旧坚持初心，为了远大理想而奉献自己，在党的工作中、在妇女运动中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一份力。

（二）新时代妇女工作展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妇女生存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长期影响，妇女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需要国家以及社会给予更多支持，以促进妇女全面均衡地参与发展。

一方面，要为妇女全面发展创造制度环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促进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2015年在全球妇女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国家框架：要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并提出：“我们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既要考虑各国国情、性别差异、妇女特殊需求，确保妇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又要创新政策手段，激发妇女潜力，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

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要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帮助她们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变化”，“要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这就能够为广大女性充分发挥潜能、为更多女性人才脱颖而出打造宽广舞台。

（作者单位：黄岩区委统战部）

参考文献：

- [1]黄岩区妇女联合会.黄岩妇女运动史[G].台州：黄岩区妇女联合会，1995.
- [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百年[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
- [3]黄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黄岩文史资料[G].台州：黄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 [4]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5]裔昭印.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第2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 [6]陈文联.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7]姜秀花.中国妇女运动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难忘的记忆 不朽的丰碑

——追忆台州革命斗争中的三位老共产党员

郑普顺

张善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不禁怀念一批老共产党员。他们奋斗在台州大地上，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战斗不息。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深厚的爱党之情，永远激励我们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邵明



全国内战爆发后，浙东共产党组织与华中分局的联系变得更加困难。1946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东党组织改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领导。

为了加强对浙东工作的领导，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主持召开了浙东工作会议，即“上海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同时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即把浙东党组织工作重心转移到台属地区，并作为浙东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心点、出发点和立足点。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将嵊（县）、新（昌）、奉（化）地区划归台属工委领导，调嵊新奉特派员邵明任台属工委书记。

邵明是鄞州人。2月下旬，邵明就任台属工委书记。在浙东工委的领

导下，三四月间，台属地区的宁海、三门、临海党组织先后动员10多名党员骨干分子到临海大石，以打猎为名组织武工队，活动于大石山区。

武工队在大石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临海地方政府的警觉，并派武装部队进行“清剿”，党组织遭到破坏。邵明面对武工队在大石、双港立足已较为困难的现实，决定到南田组建武装。

南田是台州沿海的一个大岛，活动着一支由周象银领导的武装。周象银在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三门县自卫队分队长，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辞职，后结识了地下党员董方红，逐渐向共产党组织靠拢。1946年12月，周象银找到时任中共嵊新奉特派员的邵明，表示愿意搞些枪支，组织武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

1947年9月，邵明到三门后，装扮成商人，前往南田岛与周象银会面。邵明向周象银详细了解南田岛上国民党武装和地方武装情况，初步确定收编国民党南田区自卫队武器的计划。

邵明自南田返回三门后，着手准备缴枪事宜。他派人密切注意邻近地区国民党武装的动态，将原来留在双港的王阿法、王蔚青、陶秀贤等骨干集中到枫坑。同时，台属工委决定把亭旁山区作为部队今后的立足点，并

要求三门、宁海两县党组织先做好发动工作，为以后部队的活动做好准备。

10月中旬，周象银派董方红、周象花等驾小木船到枫坑，趁天黑将邵明、王阿法等5人接到南田岛，然后与岛上周象银等10余人会合，具体研究缴枪计划。22日晚，邵明、周象银率部队在国民党南田区署所在地樊岙镇附近的南弄堂村隐蔽，准备次日行动。第二天，正逢樊岙市日，前去缴枪的武装人员化装成赶集的群众，把武器藏在柴担中，陆续到达区署门口，王阿法、周象花等人趁区署人员午休时，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自卫队员毫无戒备，全部被俘，区长戴家恩逃跑时被击毙。此次行动，共缴获轻机枪1挺、冲锋枪2支、步枪19支和一分子弹。随后，缴枪队又乘胜收缴了四部乡公所和渔霸陈邗生家的枪支。台属党组织以缴获的枪械为基础，组建起自己的革命武装，称“铁流部队”。

“南田缴枪”和“铁流部队”的建立，标志着台属工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的诞生，台属革命武装正式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周象银任大队长，邵明任政委。1948年2月12日，铁流部队从王爱山冈永乐寺出发，直插桑洲，在当

地共产党组织配合下，未经战斗就进入国民党警察所，收缴所内全部武器；接着，收缴了塔林乡公所和地主家的武器。桑洲警察所被摧毁后，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不敢在这一带重设据点，这不仅为台属工委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宁海西部开展活动打下了基础，也为打通临（海）、天（台）、三（门）通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11日，台属工委书记邵明率台属铁流部队开赴四明山，途经天台、新昌两县边界，遭到国民党天台县自卫大队袭击。铁流部队冲出包围，决定放弃去四明山的计划，改北上为南下，到黄岩西乡与浙南括苍支队会合。4月2日，邵明率铁流部队下大雷山，在临海白水洋渡过永安溪翻越括苍山主峰，于4日到达黄岩最西端的里岙村。7日，铁流部队顺利到达黄岩圣堂村，与同日到达的由括苍支队副支队长徐寿考、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万文达率领的第二中队胜利会师。圣堂会师表明连接浙东与浙南的走廊已经打通，这对于加强浙东与浙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实现上级党组织的战略意图、加速新根据地的开辟，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后，邵明历任中共台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兼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他到上海任职后，对台州的建設仍然十分关心：凡台州有人到上海找他帮助解决工作生产中的困难，他均鼎力相助。离休后，他对台州改革工放后的工业发展，也十分关注。有一次，在黄岩蜜饯厂参观时，他从原料基地、产品品种、产品质量，以及工作发展，详详细细作了询问、了解，并提出了意见。邵明同志于2006年2月份逝世。

王槐秋



王槐秋，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1934年到温岭气象测候站工作，和梁跃南、叶亮一起从事地下党组织活动，发起组建“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元旦，青战团组织各区乡分队700多人汇集太平镇。队伍由王

槐秋率领，他们走上街头，跳到肉凳上、石块上，向城乡群众宣传，高举“温岭青战团”门旗和抗日横幅，要求国民党当局收回解散青战团的决定。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全国形势急剧变化，青战团被迫解散，党的活动只好转入地下。此时，王槐秋惟一合法身份就是温岭文化消费合作社“老板”。

1940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跟踪，王槐秋转移去黄岩西乡工作，来到上郑乡直坑猫狸雷村。村里只有8户人家，村民靠种番薯挖野菜充饥，生活非常困难。王槐秋以办学为名，住在林继法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并发展林继法为中共党员。一次，放经堂东西被窃，叫王槐秋写状纸，上郑地主看了诉状，从诉状文字、语法到结构，认定是知识分子所为，有共产党隐蔽在那里，扬言要抓共产党，王槐秋得悉，就转移他处。

王槐秋离开猫狸雷来到平田桐树坑隐蔽。1940年秋，化名老赵的王槐秋，由括雁工委负责人牟维源和杨秀堂介绍住进地下交通员辛加魁家，在

后门山上搭了一间茅棚。从村上攀上羊肠小道，穿过竹棚，经过一人多高的杂草夹道，再插进杂林丛中，便能找到位于三条坑的茅棚。屋内用石块垫上木板当作眠床，几块石头一垒当作炉灶，王槐秋就隐蔽在那里。在黄岩西乡的这段日子里，他连番薯丝都吃不饱，更谈不上食物营养，体质明显下降；加上蚊叮虫咬、药物缺乏，以致双脚溃烂，烂得不能走动。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桐树坑三条坑里坚持到1942年11月才离开。

1942年秋冬间，浙东抗日部队初建，民主根据地草创，急需干部。中共浙东区党委指示台属党的领导人和已暴露身份的干部、党员，以及愿意抗日的赤色群众，均分期分批撤退到四明山从事武装斗争。台属党组织的撤退工作，椒江以南温（岭）、黄（岩）、乐（清）、仙（居）、玉（环）五县由王槐秋负责。撤退工作部署就绪以后，由鲁冰伴送王槐秋上四明山。从此，他在抗日前线，整整战斗了三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为了和平团结，在重庆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后，忍痛让出革命先烈用鲜血创建的包括四明山在

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浙东济南纵队奉命撤至苏中整编，王槐秋受命留在浙江坚持地下斗争。王槐秋以他长期积累的对敌斗争经验，同敌人巧于周旋后脱离险境，转移到台州山区发动和领导武装，直至与台工委同志一起组织攻击天台，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全台州。

解放后，王槐秋离开台州，先后在杭州市、浙江省和沈阳等工业、科技战线默默耕耘、辛勤工作；曾任航空工业部研究所负责人，为航天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王槐秋同志于1997年8月26日逝世。

张任伟



张任伟，象山丹城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从此一生军旅生涯。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都一

直战斗在前线；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从海上到陆地，四明山、天台山、会稽山都留下他的脚印。为侦察敌情需要，他常以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民众中，为勘察作战地形需要，他脚穿山袜、草鞋，头戴箬帽，腰挂砍柴刀，以山农、狩猎为名，活动在深山冷岙。他一生直接参加战斗或参与指挥大小战斗几百次。

1947年，浙东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台属地区作为浙东开展游击战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上海会议后，张任伟作为浙东军事干部来到宁海白岭根村（时属台州地区）召开台属工作会议，重点放在临海大石。会后，张任伟立即带地下党员杨民奎、鲁华等人，通过三门金甘村金贤益关系，以避壮丁、打猎名义，在芦田山组织小型战斗武工队。张任伟与鲁华到大石，又通过地下党员林山找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岭下乡乡长、秘密身份是共产党支部书记的金鹤鸣。金鹤鸣又派乡自卫队金时法为向导，陪张任伟装扮成山民，以打野猪为名，在玉峰山、荷山等地勘察地形，为打游击做准备。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台属工委书记邵明等人到大石后，在徐坑召开第一次临海中心县委会议，研究筹建武装等问题，决定从三门、临



海、新昌等地抽调一批骨干，集中到大石，开办军事训练班，由张任伟做教官，既讲革命形势，又教军事知识，训练武工队员50多名，为台属工委建立武装打下了基础。

1948年8月，张任伟随中共浙东临委书记张瑞昌，率浙东“机动部队”（原为钢铁部队），与台属的“铁流部队”合编为“浙东游击第四支队”，在台属地区打了许多胜仗。1949年2月10日，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建立之后第一次攻城战斗。事先，张任伟在宁海山洋基地接见天台青年学生汤圣贤、孙新方两人，要求他们以合法身份摸清城内的敌情，搞一张城区地图。汤圣贤在他父亲开的聘三医院召开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摸清他们的思想动向。汤、孙两人从天台县志书中搞到一张城区图，把了解的情况标在图上。春节期间，浙东部分集中东阳尖山演习攻城训练时，又有侦察参谋蒋杰到天台

城，把汤圣贤、孙新方两人和10多位熟悉天台城内情况的青年一起带到尖山。张任伟把他们安排在一处较隐蔽的地方住下，并由他们提供情况，详细制订攻城方案。2月10日攻城时，10位青年分头当向导，因此夺城战斗只花了两个小时，歼敌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步枪318支、短枪40支以及手榴弹、子弹等大量军用物资。

1949年2月17日，张任伟率“机动部队”解放三门县。这次战斗是攻打县城海游镇和重镇亭旁镇同时进行的，也是事先对敌情摸得非常清楚的，包括各地驻兵、各主要机关进出门口位置和门板牢固程度都了如指掌。因此，仅用半个小时就拿下两镇。当天下午在海游镇召开群众大会，纵队司令及浙东行署专员马青宣布三门县人民政府成立，俞圣棋任县长，梅法烈任副县长。三门县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被解放的县城。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任伟先后任宁波军分区参谋长、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和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等职。

从战火中冲出的人民公仆

——林浪传略

李 幸 斐

林浪，原名林邦兰，温岭市箬横镇解放村人，台州中学简易师范肄业，1945年3月参加新四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三旅教导营政治干事，连副政治指导员，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干部、秘书处助理员，军事检察员、副军事检察科长，现为绍兴军分区干休所副师职离休干部。

林浪于1926年2月出生在温岭市箬横镇解放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林作寿，是位劳动能手，种田、做手工业、经商都是一把好手；母亲是位任劳任怨的贤妻良母。林邦兰深受父母的影响，从小热爱劳动，并养成了良好思想品德。6岁时，他就读信文初级小学，后转至离家较远的怡性初级小学学习；后几经曲折，于14岁时进箬横中心小学读书，虽半农半读，但成绩仍很优秀，16岁就读简易师范。

1945年的中国，战火纷飞，国土沦陷，19岁的林邦兰热爱读书，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书中找到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当林邦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用铁蹄践踏中国的土地、用枪炮蹂躏残杀中国的同胞时，义愤填膺，当即投笔从戎。1945年3月，他化名林浪，告别学校安定的生活，舍弃家庭，穿过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来到四明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参加革命，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林浪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5年6月，林浪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学校位于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他边学习边参加游击战斗，校址也因此转移六次。有一次，干校数人配合部队解放上虞县城时攻下三个敌碉堡，歼敌200多人，我军

伤亡30多人。林浪也因此亲眼看到与自己一起战斗的文工队员叶平不幸牺牲。他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1946年春，国共和平谈判失败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起攻击。林浪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教导营任政治干事，从事对俘虏的教育工作。这份工作先后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其间历经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他一直严格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同俘虏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行军千里。因他教育改造俘虏工作卓有成效，获评三等功两次。

1948年7月至11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00万人；至1948年秋，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林浪有幸参加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穿梭于枪林弹雨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战功。

当时，根据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林浪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并击毙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残敌渡过运河向西逃窜。我军乘胜追击，没有渡船，战士们下河顶着门板搭起一座浮动木板桥。林浪也随师部机关干部一起下河顶门板，整整坚持了约一个小时，保证我军得以顺利渡过运河，取得战

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前夕的一次战斗中，林浪任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当时，连队遭敌王牌军新五军袭击包围，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均不幸壮烈牺牲，战士也牺牲过半，情况非常危急。林浪临危挑起重担，命令战士们坚守阵地，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七名战士，待后续部队赶到才击退敌军。

淮海战役后期，林浪在师部任保卫干事，仍做俘虏的教育工作。当时敌军新五军军长邱清泉被我军击毙，师部用棺材装殓尸体埋入土中，林浪用毛笔在木板写“xxx之墓”插在土上，然后电告南京方面来领取尸体，以此来击溃敌军的斗志。还有一次，30多万敌军被我军包围在方圆几里的阵地内，敌兵饿极。林浪随师机关干部到前线战壕给敌军送馒头“换枪”；送到与敌军相距数米远时，向敌阵地喊话，让敌兵带枪过来换馒头，我军只留枪不留人。看似一份“轻松”任务，其实非常危险：因为近距离接触敌军，万一对方开枪，林浪和送馒头的战士们就可能牺牲。但这一做法既显示我军人道主义，又能瓦解敌军，林浪和战士们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出色完成了任务。鉴于林浪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华野一纵二师保卫科获得淮海战役有功纪念章。

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坚固基础。针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军队，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一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参加渡江战役。

1949年3月，为了掌握渡江战役的作战技术，林浪随部队到长江北岸训练。师机关部分干部下到基层连队，同船工民工一起训练划船渡江，前后共一个多月。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突击部队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林浪所在的师部机关第二天渡江到南岸丹阳，华野一纵二师保卫科因此获得渡江战役有功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孤立、封锁、威胁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遭到严重的安全威胁。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重托，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林浪所在的部队于11月7日渡过鸭绿江，投入战斗。当时正值寒冬，他一身秋装战斗在冰天雪地里，因受冻支气管扩张导致咯血十多天，却一直坚持战斗。有一次战斗中，部队出其不意向敌军展开攻击，敌军南逃。

林浪也参加了这次伏击战，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最后毙敌十多人。后来，林浪被调到师医疗队做兼职指导员一个月，主要任务就是在前线抢救伤员、抬担架，休整时上山砍树给伤员建造防空洞。当目睹伤员流血甚至献出生命，他把支气管扩张复发经常咯血也就不当回事了。第五次战役打响时，他患上肺结核，但根本顾不上医治仍坚持工作。由于林浪从事的机要保卫工作有突出成绩，他在朝鲜战场先后获得三等功、抗美援朝军功章、抗美援朝有功纪念章。但战争后期，因他的支气管扩张和肺结核加重，鼻腔、口腔化脓，只好下战场回国治疗。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步步展开，林浪这位从战火中冲出来的革命战士，带着一身伤病，马上投身到建设浪潮中。不管社会发展如何艰难曲折，他随时随地不忘初心，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公仆，是林浪在南京军区高级军事领导机关时的形象。

随着有计划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党的干部管理工作面临着新情况。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当时林浪在南京军区保卫部军事检察院参加审干肃反工作。他从1948年就开始做政法工作。因为是老

政法干部，他经常被派到城镇乡村“外调”取证，几乎跑遍三分之一中国。他本着不放过一个疑点的查案态度，逐个甄别各类案件数百起。

1958年至1960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加上天灾，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随后两年，人民的经济生活面临严重贫困。

林浪虽然身患各种疾病，但为革命工作从来都是吃苦在前，并与老百姓患难与共。

上世纪50年代，林浪经常下部队检查帮助工作，一般都是背着战时的背包（被子、床单），同连队干部或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汇报反映帮助解决问题。

1960年，林浪下农村参加“整社”（整顿人民公社）运动，在南京浦江县一个生产大队任整社工作组副组长半年，发现农村干部“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仍很严重，把农民口粮当公粮上交，造成百姓严重饥饿。到1960年底，“三风”制止，但老百姓已无铁锅等生活生产工具（充公当“大炼钢铁”原料）。林浪他们工作组就日夜挨家核算退赔，政府贷款解决；另一方面工作组同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生活困难，老百姓健康质量严重下

降。这段时期，过度劳累的林浪患上肝炎、胃肠炎，战争年代患过的肺结核、支扩复发，但他仍坚持工作，体重下降30多斤，骨瘦如柴。

1965年林浪下工厂参加社教（社会主义教育）三个月，仍与工人们同吃食堂、同住集体宿舍、同在车间劳动、同学习讨论，那时他还带着两个十岁左右孩子参加劳动锻炼。

在南京军区高级军事领导机关工作时，普通老百姓看来是高级领导干部手中有权，但他仍有权不谋私。有这么一件事，50年代时，他家乡大队书记要侵占他父母住房，并诬陷他父母为地主（实为小土地出租者：后来平反）。当时他和大哥林克光都是解放军团营级领导干部，可他俩严格执行党中央“领导干部不得干涉党组织和政府亲属的处理”的规定，直到1979年他父母才得以摘掉地主帽子。他虽心疼于父母的含冤，但自始至终执行着党的方针政策。

1970年，由于积劳成疾，44岁的林浪不得不离职休养，可直到现在仍顽强地活着。这不得不说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奇迹。

乐观自信的林浪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他秉承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在疾病面前，从不悲观失望，总是乐观地努力探索生命科学的真理。

林浪不断学习，编写大量文章用

以自勉和教育下一代。他撰写了《论“多予少取”》《坚持理想信念习惯》《我要读书》《追求》《参加新四军》《浅论唯物辩证法应对疾病》《坚持理想信念信念书法集》等大量文章。

林浪还持之以恒练习书法，书法作品入选中国书画协会《精英集萃中华》一等奖、全国老人书画大赛佳作奖等。

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四个子女均事业有成，他为祖国输送了真正的有用人才。

今年96岁的林浪，差不多和党一起成长，应该说是踏着党的足迹成长。他带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穿梭

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他带着一身伤痛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一辈子如一日，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居功不傲，始终保持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这个光辉日子里，我们更要歌颂像林浪那样的革命功臣，更要学习像他那样的人民公仆。

注：本文根据林浪《一生点滴回忆》加以整理。

（作者系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

（上接第49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真抓实干、始终不渝地稳步增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提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满意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红船精神”作为党的思想财富、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历久弥新，非常珍贵。新时代新征程，不管乱云飞渡还是风吹浪打，台州广大党

员干部将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践行“红船精神”，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永远奋斗、甘于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奋力谱写台州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为浙江“重要窗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

百年“红船精神”在台州大地绽放光芒

罗灵英

一百年前的夏天，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红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艘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红船精神”应运而生。2005年6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文章，对“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和传承弘扬“红船精神”的重要意义作了精辟阐述。文章深刻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蕴含着磅礴力量，彰显着恒久价值。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必将推进伟大的事业。一百年来，“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基因，不仅在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进程而一步步展现出来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中存在着，也支生出了大陈岛垦荒精神、长潭水库建设精神、创业创新的台州人文精神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地方精神。这些地方精神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相通相融，激励和鼓舞着台州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红船精神”引领台州干部群众脚踏实地、大胆探索、创业创新，是激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竭动力

1921年，中国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浙江南湖红船点燃星星之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勇于创新、富于进取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全部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在

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光辉历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保持蓬勃朝气、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有力武器。“红船精神”昭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台州广大干部群众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在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立足实际、大胆探索，以创新创业的精神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动力源泉。

回顾台州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艰难曲折历程，我们由衷地感到，台州革命的胜利如同中国革命一样，虽曾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台州干部群众根据党中央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开拓创新，发展自己，最终赢得了台州民主革命的胜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台州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党的有生力量，8月，中共台属特委创建了一条台属至苏北的地下交通线。特委把三门作为接待转送干部的起点站，建有多个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和临海、天台、宁海等邻县相通，形成了以三门县为中心的交通联络网。此外，台属共产党组织还派人在宁波、上海、南通等地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并成

立由台属特委直接领导的中共上海特别支部，负责撤退干部的接待和转送工作。从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共有100多名干部通过这条新开辟的地下交通线，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安全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从而使台属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得到保存，最终使革命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以后，台州开始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样得益于台州人民发扬敢想敢干的“红船精神”，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股份合作制经济。1973年芦浦的6位农民和其他村民集资2400元创办了芦浦工艺厂。1980年，通过这种“打硬股”的办法，芦浦的股份合作企业就发展到了58家，总产值达436万元。1982年底，温岭县社队企业局发文同意牧屿王华森等人联合创办温岭县牧南工艺品厂。这是全国首家由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的股份合作企业，标志着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开始萌生。1984年初，温岭县工商局正式确认股份制企业为集体经济，在工商登记中具体表述为“集体（合作经营）”，标志着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台州正式诞生。中央〔1985〕1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股份式合作企业”，这为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极大地调动了台州人民兴办股份

合作经济的积极性，引发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第一轮发展浪潮。1987年，台州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浙南）之长，走自己的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高潮。到1988年底，台州股份合作企业发展到7275家，创产值32.7亿元。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取股份制和合作制之长的具体经济制度，灵活简便。鉴于当时台州农村地区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情况，少数思想开明、讲求实际的基层干部只能积极采取变通方法支持股份合作企业创建，那就是让股份合作企业戴上“社办集体（合作经营或联户经营）”的“红帽子”。台州农民和基层干部这种与旧体制“挑战”的勇气、胆量和行动，其历史意义可与安徽小岗村农民的伟大创举相提并论。股份合作制体现了台州人创业创新精神，极大地促进了台州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使台州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历史任务，促进了台州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在创造别具一格的“草根经济”的同时，又孕育了独具魅力的“草根民主”。“民主恳谈”是温岭市原创的新型基

层民主形式。自1999年6月“民主恳谈”在温岭松门试行以来，由于方式的新颖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吸引了大量群众自愿前来参加，取得了超预期的效果。2000年8月，温岭市委要求将活动范围由镇、村两级向非公有制企业、城镇社区、事业单位和市级政府部门延伸。随后，台州各地涌现出如“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夜谈会”等基层民主创新的载体和形式。为了使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台州市委于2001年5月以中心组学习（扩大）会的形式，对全市范围内的基层民主制度和形式加以规范，统称“民主恳谈”。在实践中，“民主恳谈”致力于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模式，并取得成效。2004年3月，“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民主恳谈”是台州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开放政府、拓展参与，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走出了一条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良性互动的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了台州民主政治建设新进程，是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它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建设。

综上所述，从开辟地下交通线，

到全国股份合作制的重要发祥地，再到“民主恳谈”的诞生地，台州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坚持从区域实际出发，依靠自身力量，与时俱进地发掘、欣赏、保护、推广、发展新生事物，激发创业热情，成就了民营经济、民主政治、民生社会协调发展、整体跃进的台州现象。

二、“红船精神”鼓舞台州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是汇聚创造辉煌、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红船奋楫破浪、扬帆远航，象征并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同舟共济、风雨兼程，朝着远大目标奋勇前进。党的“一大”会议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不怕风吹浪打，不惧急流险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红船精神”昭示我们，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必须坚定信念、顽强拼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奋勇前行，始终保持迎难而上、克难攻坚的勇气和斗志。只有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认定目标，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才能成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台州广大干部群众受“红船精神”的鼓舞，以不畏艰辛、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和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工作作风，在推动台州高质量发展上全面发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大陈岛是一颗充满红色记忆的“东海明珠”，是浙江、台州的重要政治地标和精神高地。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随后，盘踞在大陈岛（距离一江山岛7.5海里）上的国民党军队组织逃离，将岛上居民几乎全部劫往台湾，并在岛上对军事和民用设施进行大肆破坏。2月13日，大陈岛解放。11月底，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浙江考察青年工作时，提议组建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这一倡议得到温州、台州青年的热烈响应，短短几天，就有800多人报名要求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经过挑选，温、台两地首批227名热血青年于1956年1月31日告别了安逸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亲人，高举“建设伟大祖国大陈岛”旗帜，登上大陈岛垦荒。从1956年1月至1960年7月，先后共有5批467名男女青年投身大陈岛建设。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

开荒辟地，燃烧青春，重建家园。通过五年多的志愿垦荒建设，到1960年，大陈岛发生了巨大变化。岛上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新开垦土地1000多亩，共修建房屋2000多间，新建了医院、文化站、广播站、气象站、邮电所、百货商店以及大陈小学、幼儿园等，还新建了2座码头、20多公里公路、2座水库。可以说，大陈岛的垦荒史，就是一部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吃苦耐劳，破难而进，绝不退缩，誓把荒岛变乐园，积极投身祖国海防建设的奋斗史。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牵挂着大陈岛。1985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大陈岛。2006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到大陈岛视察并看望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的“老垦荒队员”，肯定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2010年和2016年，习近平同志又先后两次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及其后代回信。习近平总书记“一次登岛、两次回信”，赋予了大陈岛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红船精神”永存，垦荒精神不老。大陈岛垦荒精神是一种和平建设时期的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内涵相同、一脉相承，是红色基因的体现，是当代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有着

重要位置。

和大陈岛垦荒一样，长潭水库能够艰难建成，也是台州干部群众受“红船精神”鼓舞，始终坚信铁肩扛起担当，幸福需要奋斗，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战斗”成果。1958年10月，浙江省八大水库之一、“台州大水缸”长潭水库开工建设。建造长500多米的拦洪大坝，在当时的条件下，非常困难。黄岩县委和工地党委领导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发扬愚公移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施工中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终于在1963年建成高35.5米、长506米的拦洪大坝。1964年底，长潭水库主体工程竣工。历时6年，历经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投资2873万元，投放855万多个劳动工，开展了一场场与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艰苦斗争，终于建成了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湖面面积达36平方公里、集雨面积达441.3平方公里的大型水库。长潭水库自建成投入运行以来，为台州的经济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水资源保障。“长潭水库建设精神”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价值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是我们党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艰难险

阻的制胜法宝。

改革开放以后，“七山一水两分田”、缺比较优势、少优惠政策的台州，一代洗脚上岸的农民敢闯敢冒，甘于吃苦。他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在大江南北的大小城市、各种厂矿企业里，从当地的车库、堆场上，甚至垃圾场里，捡出来、买回来一台台报废的旧机床、旧电机，进行大拆大解，运回路桥，汇集到市场后重新进行分配。“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具有“四千”精神的台州人民借助上海、宁波、武汉这些大城市快速发展的东风，依靠“两建一出”（建材业和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完成原始积累，然后投资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来繁荣市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循环的格局中，台州人民又通过与发达沿海城市开展交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有效吸纳、汇聚各地商业文化精华，使台州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了台州经济发展奇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不等不靠、独立自主、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无所不往、敢闯敢冒的台州人，继续弘扬和传承“红船精神”，努力写好“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凝心聚力再创新辉煌，奋力

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台州篇章。

总而言之，大陈岛垦荒精神、长潭水库建设精神、台州民营企业家的艰苦创业精神都是台州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有机组成，是“红船精神”在当代的延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长久以来，台州干部群众受“红船精神”鼓舞，从强化奋斗精神入手，始终做到坚定理想、勇挑重担、排除万难，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红船精神”鞭策台州地方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求真务实、忠诚为民，是形成上下联动、和衷共济的强大合力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红船凭水而立、依水而行，喻义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亲密无间、相互依靠、共同成就。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忠诚为民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

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只有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才能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台州广大党员干部自始至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做到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不仅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更是千方百计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全国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写的《党内通讯》中，分析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6个关键问题，包括包产、密植、节约粮食、讲真话等，要求全党必须认真调查研究。为了搞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台州各县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组织开展了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的典型调查，其中，黄岩松塘调查在全省深具典型性和影响力。6月初，黄岩县委副书记贾俊才带领政治研究室3名干部到路桥公社松塘生产队调查农业成本增高和农民收入减少情况。该生产队系水稻高产区，地处平原，尤以茭白生产最为有名，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围绕“农民积极性”这个中心议题，调查人员通过召开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座谈会，结合走村进户的个别访问，查对有关统计资料和财务分配资料，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以收集到的资料和干部社员

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调查结果，《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的调查报告》于6月30日整理成文。《报告》如实反映了当时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干部作风浮夸不实，强迫命令，生产瞎指挥；农民因受提高积累、高征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收入减少，肚皮吃不饱，生产积极性大大受挫。《报告》不仅分析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原因，还道出了农民心中的呼声。《报告》成文后，8月上旬，受到当时正在温州地区调研的省委领导的肯定。《松塘报告》充分体现了“红船精神”忠诚为民的本质所在，坚信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的地方改起、从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抓起，才能真正体现宗旨意识，才能真正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牢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一种红色基因，是一代又一代台州共产党人的履职座右铭。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农民增收，台州党委政府立足实际，挖掘地方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提出“两水一加”（水果、水产和食品饲料加工）的决策方针。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把发

展“两水一加”作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来抓，给以政策、财政扶持；台州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轰轰烈烈地开山整地种水果、沿海滩涂搞养殖。在地方党委政府“两水一加”思路和“一手抓开发，一手抓流通，中间环节抓加工”的方针指引下，在台州人的创业精神推动下，以“两水”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迅速兴起，工厂遍地开花。根据相关统计，1980年前台州仅有黄岩罐头厂、临海乳品厂等少数几家食品加工厂，而到了1985年，全区有食品、水产、料（鱼粉）加工企业2098家，年产值达6.5亿元，加工各类水果罐头12万吨。1985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台州地区从实际出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兴山海之利促加工业发展》的文章，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报道台州地区根据当地实际，兴山海之利，抓“两水一加”，走种、养、加一条龙道路的经验，值得提倡。自此，台州经验被全国推广。“两水一加”让台州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台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找到了出路，实现了人力与自然资源优势的结合。这一富民创举得益于“红船精神”鞭策。台州党委政府懂得，只有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进入新时代，台州各级地方党组织一如既往，始终积极回应百姓关切，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台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第一时间吹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集结号，沉着应战，全市上下迅速行动，一线医务人员和基层防控人员全力拼搏，600多万人民群众众志成城，以非常之策、非常之力交出了疫情防控的高分报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各级基层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都为打赢这场“战争”付出了努力，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无私无畏、倾情奉献的先进典型。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感人身影，党员干部舍身忘我、冲锋在前的铁肩担当，各行各业坚守岗位、向险而行的无畏身姿，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守望相助的动人情景，都定格成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画卷。台州之所以能够交出“两手硬、两战赢”的高分报表，是地方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忠诚为民，引领广大群众团结一心、和衷共济的出色战果，集中体现了台州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由此可见，“红船精神”鞭策着台州各级地方党组织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下转第41页）

黄岩区“五位一体”数字化 驱动党史学教唯实惟先

陈 献 之

黄岩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盘活红色资源，率先运用数字化思维、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传播，以党史档案文献数据库、党史场馆基地数据库、党史宣讲人才数据库、党史媒体宣教数据库、党史学教实践数据库等五大共享云平台为基轴，以“党史图书馆”“党史红地图”“宣讲联合体”“掌上党史馆”“学史实践站”等为切入点发力点，驱动党史学教唯实惟先。

一、党史档案文献数字化共享云平台：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以“党史图书馆”为切入点：一是对党史资料进行“数字化”。建立“数字档案库”，对党史资料室里的黄岩党史基本著作、档案资料及图片、视音频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加工，通过OCR识别、PDF封装、目录导航编辑、元数据著录等技术处理，推动党史著作、档案资料、影音图片等，实现红色资源从“纸上”到“指尖”。二是

对党史文献进行“数字化”。档案资料数字化建设，为编写《黄岩党史一卷》《黄岩党史二卷》《黄岩党史三卷》《橘乡百年群英谱》《潮起永宁江》《中共黄岩百年党史（图文版）小红书》等黄岩特色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乡土教材”提供了极大便利，让尘封的党史“亮了起来”，为建立“数字文献库”提供了支撑。

二、党史场馆基地数字化共享云平台：让传统展馆“动起来”。以“党史红地图”为切入点：一是建立“VR陈列馆”。在台州红色地图及黄岩党史地图的数字地图上开设黄岩7个红色纪念馆和2个党史主题公园的“VR陈列馆”。通过手机链接点击，对陈列馆展开沉浸交互式体验，使党史教育更加生动鲜活。二是建立“智能纪念馆”。对7个党史教育基地进行多媒体数字化改造提升，让党史学习教育“打开模式”更新鲜、更灵动。如对平

田乡桐树坑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的内部进行了改造提升，安装了幻影成像、电子翻书、电子触摸屏等数字智能展陈设备。在电子翻书里，黄岩区还设计了“永小宁讲桐树坑革命精神”的动漫形象宣讲短片，吸引不少青少年前来观看。

三、党史宣讲人才数字化共享云平台：让学习教育“强起来”。以“宣讲联合体”为切入点：一是建立多元化构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联盟。从教授学者、8090青年、退伍老兵、民间能人、中小学教师等各界群体中，精心选拔培育宣讲骨干，多元化组建“专家学者”宣讲团、小青橘“后浪青年”宣讲团、“银龄老兵”宣讲团、“乡村大使”宣讲团和“星火”企业党课团等59支特色党史宣讲团。持续开展“百年党史青年说”“永小宁动漫党史故事”“跟着总书记学思维”“千名书记讲党课”“银龄说史”等宣讲活动。目前，全区已组建73支特色宣讲队伍，党史宣讲员509人，总计宣讲近2000场次。二是开展移动终端点单式宣讲。制作主体分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讲清单，以“单位点单”“宣讲团送讲”的形式开展以“引领式带头、分众式传播、立体式融合、浸润式互动”四式并举的方式巡回宣讲，全方位构建党史宣教联盟，推动百年党史入脑入心。

四、党史媒体宣教数字化共享云

平台：让党史宣传“新起来”。以“掌上党史馆”为切入点：一是挖掘红色资源。黄岩是一个红色资源相当丰富的地方。据统计，黄岩上报省里的革命遗址有18处，被上级认定为革命老区的有5个乡镇、84个村居。仅记载在册的黄岩籍烈士就有178名。为了挖掘他们的英雄事迹，纪念黄岩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黄岩不仅建革命纪念馆，还出版了《黄岩党史小故事百例》等党史读本及相关党史视频，编演桐树坑话剧《信念》，创作《桐坑星火》交响乐等。二是实现线下线上贯通。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史”宣教新平台，打造“黄岩掌上党史馆”网络平台，把线下的党史馆、革命故事视频等都放到网上，内容涵盖党建、廉政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三是推出党史特色专栏。在“掌上黄岩”“橘传媒”等线上平台推出“百年党史、百秒阅读”“学百年党史，开时代新局”等特色专栏，“黄岩掌上党史馆”平台阅读量不断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五、党史学教实践数字化共享云平台：让党史宣讲“火起来”。以“学史实践站”为切入点：一是串联党史宣教轴线。全面升级黄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践所、实践站的数字平台，串联起区乡村各个点位、立体式、多辐射的党史宣教轴线，全面启动“百站千场万人学党史”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二是开通“红色公交专线”。包含一辆红色公交车、一张党史地图、一袋红书、一系列党史纪录片、一位党史讲解员的“五个一·红色公交打卡专线”，对专线车体外观和沿路站牌进行党史主题化改造，在车上配备红色书籍、党旗党徽等，随车播放《永小宁讲党史》《桐坑星火红一片》《圣堂会师马啾啾》等红色短片，目前已开通7条15辆车次，每天运行60班次，带动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往年翻两番。三是开展各类文艺演出。开展“颂歌献给党”“唱支山歌给党听”“红色文化进万家”等文艺活动，制作《星火桐坑》交响乐及话剧，拍摄《黄岩西乡农民打盐厥》等红色微电影。四是举办各类知识竞答及猜灯谜朗诵等活动。举办全区“庆祝建党百年党史知识竞

赛”、“百个支部百年党史知识打卡挑战赛”等活动。五是开展乐享数字志愿行。开展乡村乐享数字化文明实践志愿行活动，在“文明实践站”举办如何用手机、电脑进行党史学习的培训，教会农民在数字化终端上使用文化志愿服务菜单，提升学习效率和工作水平。六是开展学史力行实践活动。一是以全域协作为抓手，探索共富新路，推行“小橘灯”暖心工坊、“小橘屋”安居保障、“橘光社区”便民服务等帮扶举措，打响“橘”系列协作帮扶品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以“永宁企管家”为抓手，推出助企新招。三是“善治永宁”。四是以百余项破难攻坚为抓手，打开发展新局。

（作者系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上接第64页）事迹为支撑，开设“红色课堂”，开展“重温一次入党宣誓、诵读一段党史文献、参加一次场景体验”等活动200余场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责任。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打造“空中课堂”。在“掌上三门”客户端开设党史学习专栏，分为7个板块，定期推送工作动态、党史小故事、宣讲微视频等学习内容，让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日常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学习，日积月累渗透

式推进党史教育，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目前已上线116个视频、进行35次微直播、阅读量累计超60万人次。三是聚焦党史学习成效，打造“实践课堂”。把学习党史同研究解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沉到基层一线调研，列出项目清单，实行挂图销号，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工作举措。

（三门县委党史研究研究室）

从“台州式的硬气”到“黄泥墙精神”： 地域文化传承与地方革命精神塑造的 仙居样本

朱 成

内容提要：地域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根源和载体。仙居作为一个革命老区，有着“台州式的硬气”这样的优秀地域文化和“黄泥墙精神”这样的革命精神。本文从“黄泥墙精神”的生成土壤、精神内核、实现条件、根植前提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地域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塑造之间的关系，并对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好地域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提出了建议。

关键字：地域文化 革命精神 “台州式硬气” 仙居

地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祖国大地的“活态存在”，革命文化也正是通过特定地域内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的革命实践，由此融入到了当地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成为构成地域文脉的重要因素。^①地域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又是中国革命文化的象征，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对于培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革命文化为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魂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应当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与视域中进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特色优势。本文通过对仙居地域文化精神深入、系统的分析，从“黄泥墙精神”的生成土壤、精神内核、实现条件、根植前提等方面，梳理了该精神产生并升华的原因，阐述了“台州式硬气”与“黄泥墙精神”之间的

^①蔡方鹿 罗海军《地域文化、时代思潮与民族精神》《光明日报》（2014年04月22日16版）

联系，以期为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结合、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一点探索。

一、“台州式的硬气”与“黄泥墙精神”：仙居的宝贵精神财富

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台州三面环山，一面滨海，山的巍峨、海的辽阔加上古越族特有的文化基因，铸就了台州人刚烈不屈的“台州式硬气”。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祖师、明代著名学者王士性说：“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渐北则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尤朴茂近古。”^②这表明，台州称山海之地，存朴茂之风，自宋以降，民唯耕农是尚，人重节义，洁操刚烈，勇往直前，风气所致，至今犹然。随着鲁迅作品中对柔石和方孝孺“台州式硬气”的赞颂，“台州式的硬气”作为台州的独特文化符号家喻户晓。方孝孺和柔石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他们的人生目标也截然不同，但两者的人格品性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谓光照后先。不过，“台州式硬气”应该属于台州这一地域范围内

古今人物的群体“画像”，从古至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仙居是台州历史和地理的源头，位于台州母亲河—灵江上游永安溪畔的下汤遗址距今已有一万多年，境内有多处古越族活动的遗迹。作为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区县，仙居的先民“石气所钟，猛烈鸷馐，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③。仙居人的硬气是台州式硬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仙居曾经出过50多位监察御史，个个刚正不阿、勇斗奸佞，这是仙居人身上台州式硬气的突出体现。^④

仙居也是一片革命的热土，作为革命老区县，是全市乃至全省革命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红十三军、挺进师等革命队伍在这里英勇战斗，无数革命英烈在这里抛洒热血，红色革命基因在这里代代传承。在仙居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党的组织经历了“四起三落”，涌现出金永洪、杨通海、朱福真、曹金库、齐治平、张小娇等一大批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红色战士，并形成了仙居“黄泥墙”革命精神。

“黄泥墙”精神，是解放初仙居第一任县委书记李振洲首先总结出来的。他到仙居后，了解到仙居人民“四起三落”的革命斗争经历，颇为感慨。他

② 李一周琦《台州文化概论》中国文艺出版社2002年162页

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5页

④ 仙纪《风骨——仙居御史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5页

说：“仙居的革命力量就像‘黄泥墙’，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很坚韧，哪怕经历了风吹雨打，也屹立不倒。即使被推倒，散落的泥土和碎石也能很快重筑，为革命提供坚实的屏障”。“黄泥墙”精神象征了革命斗争时期仙居人民留下来的根植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拼搏、英勇无畏、兼容并蓄的精神。^⑤

二、“黄泥墙精神”产生的地域历史文化渊源

仙居的“黄泥墙精神”并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突然凭空出现的。它的产生必定也是根植于仙居当地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传承自仙居传统的地域精神。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嫉恶如仇、追求真理的民风是黄泥墙精神的生成土壤

仙居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群山环绕之中，山的硬气也熏陶出了仙居人“认死理”“不圆滑”的彪悍民风，用官方的话说仙居人“不服教化”，好争个是非曲直，好诉讼。宋明时期，仙居受儒家思想的浸淫日久，原彪悍之民风逐渐与儒家所倡导的“以人殉道”观念融合，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特质。这种独特的精神特质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桀骜不驯，认理不认人。特别是在仙居籍官员身上，这种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官员，若在地方任官的，则都喜

欢跟土豪、权贵较劲；若在京为官的，则个个能够忠亮端方，无所避讳，敢批龙鳞。如宋代的郭磊卿一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和当朝炙手可热的丞相史嵩之过不去，具疏弹劾，结果被算计身亡；明代的林应麒在任金溪县令时，著文惹得严嵩不快，被罢官；李一瀚则干脆拿严嵩的干儿子梁绍儒开刀；吴时来则直接上疏皇帝，弹劾严嵩、严世藩不法。当严嵩设计把吴时来打入打牢、严刑拷打逼问谁是幕后主使时，吴时来回答到：“祖宗设言官为锄奸，此为主使”。充分体现了仙居人嫉恶如仇、坚持真理的“台州式硬气”。

到了近现代后，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仙居一直是中共台属、处属、浙南三方党组织四面进入、交互发展的热点区域，兼具山的硬气与水的灵性的仙居人民在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进仙居后，受到了革命理论的引导，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自此以后，仙居的革命者便把革命的理论奉为真理，朝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目标百折不挠、奋勇前进。1919年，陈静秋、陈国治、陈念邦等10余名仙居籍爱国学生组织“五四”宣讲团，率先在仙居境内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活动。1927年3月，王焕忠成为仙居第一位中共党员。1928年3月，中共仙居小组成立，是仙居第一个中

^⑤《仙居县县委旧址纪念馆讲解词》仙居县党史研究室编 1999年 3页

共党组织。^⑥1930年9月8日，中共仙居县委的成立，标志着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仙居达到第一个高潮。仙居的广大群众于是认准了革命这条真理，唯党是从、广纳博取，使得这方神奇热土革命英豪四方云集，革命斗争波澜迭起，革命火种生生不息，真正成为一个“红旗永远不倒”的革命老区。而党领导的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和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则是顺应了世世代代劳苦大众铲除社会不公、消灭阶级剥削、翻身解放做主人的千古夙愿与最大梦想。

（二）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传统是黄泥墙精神的核心内含

仙居的山谷之民越族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传统，加上东晋“永嘉南渡”与宋代“靖康南渡”，不少侨民迁徙聚族而居于仙居，移入了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形成了“民性强悍，人不畏死”的精神。早在隋代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仙居蔡道人就举行起义反隋，攻占县城。北宋，为反抗暴政，仙居吕师囊就配合方腊在仙居吕高田揭竿起义，众至万人，先后攻克仙居、黄岩、天台、乐清四座县城，震撼浙东南。南宋末年陈仁玉誓不降元，率众在台州拼死抵抗，失败后隐居山里绝不仕元。1552年-1561年间，倭寇7次入侵仙居，都遭到了仙居人民的顽强抵抗。清顺治四年

（公元1647年）仙居人徐守平不服剃发令聚众反清，率众数万与清军激战于管山头。明清两代仙居有“红包头”“白包头”“哥老会”等大小起义10多次。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仙居人民不畏强暴、刚烈不屈的反抗精神。

在1927年-1949年广袤秀美的仙乡大地上，面对国民党反对派政权的残酷统治，一群仙居人中的优秀分子，发扬仙居历史上不畏强权、追求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前仆后继，屡挫屡奋、屡奋屡强，为我们在阴云密布的荆棘丛中，趟出了一条向往光明的求索之路、一条艰难曲折的斗争之路。以金永洪为队长的红十三军仙居游击队，近五年时间面对强敌，不畏牺牲，坚持斗争，开展大小战斗数十次，谱写了一个又一个革命传奇。1930年7月26日，杨通海、朱福真遵照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发动组织农民武装，会同临海西乡农军和黄岩红军游击队近2000人，于拂晓攻打仙居县城，包围县城两天一夜后撤出战斗，农军与红军游击队牺牲20余人。1939年2月，民生中学党小组建立，党组织的发展再次呈现星火燎原之势。1940年2月，在中共台属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仙居第二次建立了县委，带领仙居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尽管随着国共合作破裂，1944年县委遭到了彻底破坏，

^⑥ 仙居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仙居简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2页

但革命的星火并没有就此熄灭。此后，中共处属特委、中共浙南特委分别建立了“缙仙边区”和“仙临黄边区”，继续领导革命斗争。1949年7月5日，在南下解放大军和全体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仙居县城解放；7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仙居终于取得胜利。

（三）行侠仗义、英勇尚武的传统是黄泥墙精神的实现条件

仙居自古尚武之风浓郁。仙居历史上共有进士217人，其中武进士就有112人。^⑦历史上的武举人更是数不胜数。仙居还出过四位武状元。分别是宋开禧元年，胡谦，特奏第一，终如皋县尉；宋嘉定十三年陈正大；宋咸淳元年张会龙，判来州；宋咸淳十年顾玉文，授秉职郎，同正将。^⑧在仙居民间的古宅里，随处可见古人练武用的石哑铃和刻着重几百斤的练功石。在千百年来的武术传承中，精湛的武艺和狭义的精神在不停地继承着。革命时期仙居共产党人中不少是“武林高手”。比如红十三军游击队的领导人金永洪、杨通海、朱福真等人，个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天赋异禀。如杨通海，他的祖辈曾经是反清复明组织的地方领导人，历史上家族中有不少武林高手。杨通海本人也武艺高强，且富有侠义精神，在当地

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朱福真的上辈也曾经是武举人，家族有练武传统。据朱福真村里老人回忆，他从小喜爱练武，成年后武艺高强，好打抱不平。又一次，为了逃脱追捕，他居然能够一跃跨过一条四五米宽的壕沟。金永洪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猎人，他的枪法奇准，且体力惊人，在仙居的崇山峻岭中穿梭自如，如履平地。正是仙居革命者高强的武艺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才铸就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胜利的丰碑。

例如1930年8月31日，红十三军红一团（师）攻打缙云，仙居独立中队及尹成明部参加。独立中队挑选十余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冒枪林弹雨沿桥面匍匐前进，击毙桥头堡敌机枪手，部队迅速冲过铁索桥，一举攻克缙云县城。1930年9月，红十三军军部指派李振声、楼其团在横溪六都独湖召开仙居境内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仙居游击队，指定金永洪为队长，统率仙居境内各游击武装500余人枪，隶属红一团（师），参加了9月21日红一团（师）攻取乌岩战斗，并取得了胜利。1930年10月，国民党调集陆军第一三五旅，浙保第三、四、五、七团以及台州、温州、处州地方民团共万余人对红十三军进行疯狂围剿。金永洪与红十三军干部

^⑦李一周琦《台州文化概论》中国文艺出版社2002年142页

^⑧《康熙仙居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56页

楼其团、王振康、雷高升等人率领仙居游击队，利用山高谷深地理优势与敌周旋，先后取得龙潭头伏击战、溜头岭伏击战、溪头岗阻击战、万竹王火烧叛徒、牛脚稻田垄伏击战、尚仁突围战、龙潭头夹击战、骑马坑伏击战、合击八字墙保卫团、消灭上井保卫团、袭击章山保卫团、景凤岩脚伏击战等战斗胜利，予敌重大杀伤。^⑨

（四）泽被苍生、牺牲为民的情怀是黄泥墙精神的根植前提

仙居的传统地域文化中特别注重仁爱之心。仙居的许多村名都带有一个“仁”字，如厚仁、怀仁、尚仁、增仁、安仁、仁庄等。这些村名的来历都与其先祖悲天悯人，仁爱济民的善行有关。如白塔镇厚仁村，其吴氏先祖吴谓在自家建了瞭望台，每到做饭的时间就上去眺望看谁家还没升起炊烟，若是因为没米下锅，他就派人送米接济。吴氏先祖仁爱济民的善行很多，因此村名改为厚仁。再如下各镇怀仁村的由来，是因为村里顾氏先祖顾一帖路过此地时，看瘟疫横行，横尸遍野，于是毅然留在此地治病救人。战胜瘟疫后，当地村民留顾一帖在此定居，改村名为“怀仁”，意为感念顾一帖的妙手仁心。在这种文化的不断熏陶下，仙居历史上的官员们也大都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如

明代的仙居名宦王存忠，治理镇江有方，爱民如子，政治通明，百姓安乐；草鞋知府，廉洁之操，风靡朝野。王存忠离任归家之日，只见得“囊橐萧然”，无行李可言，穿着草鞋，告别镇江。而自发前来送行的镇江父老，却是人山人海，挤得镇江街衢水泄不通，以至“车辍不得行，父老列道，苏苏泣下”。中国古代廉官离任时，的确是“官行一担书，民送两行泪”。铁石心肠的王存忠也为之动容，堂堂八尺男儿，竟然热泪横流，“洑澜久之”，恋恋不舍，久久不肯离去。^⑩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居的革命者们把这种爱民的傳統升华成了心系苍生、革命为民的精神。如朱福真烈士因为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压奋起参加革命后，先是在仙居的崇山峻岭的盐路上“劫富济贫”，专门保护那些挑私盐的贫苦百姓。杨通海烈士，原本家境比较富裕，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追捕他烧光了其家乡朱溪镇上岙村所有村名的房子后，他变卖所有家产帮助乡亲们造回了房子。仙居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自然灾害较多，广大贫下中农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土地革命时期仙居共产党人斗争的核心之一就是“减租减息”，帮助人民群众争取利益。1928年夏，仙居

^⑨ 仙居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仙居简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10页

^⑩ 《光绪仙居县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256页

中心支部利用农会、工会基层组织成功发动以“减少原租额25%”“提高手工业者工资、统一全县手工业者工资标准”为主要诉求的“减租增资”斗争。1929年12月，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寺前下塘朱福真发动里坎头、柯思忒等村群众驱赶陈报官，烧毁土地陈报单，揭开了仙居“反土地陈报”斗争序幕。1940年2月，中共仙居县委将减租作为推动农村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由县委委员、宣传部长郭载美具体负责。5月底，上王农会成功改组，减租取得了基本胜利——暂减原租额的10%；6月，又成功改选马鬃乡杜婆桥、岭下彭等村农会，并在这两村成功实行“二五减租”。三溪乡农会在中共党员、国民党乡长齐治平支持下，也取得减租斗争胜利。1946年冬，中共处属特委发动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抗丁、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为内容的“三反六抗”斗争。斗争在蓬台叶岩头拉开帷幕，很快在安仁、金竹、德化等地蔓延，使国民党在这一地区壮丁无法抓，捐、税、粮无法征，租、债无法收，而广大贫苦农民则看到了团结的力量。^①

正是仙居共产党人这种革命为民的理念和行动，深深感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也纷纷用实际行动来支

持革命。正是人民的支持，仙居的革命斗争才有了群众基础和生存土壤。仙居的革命史中，也有不少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仙居的刘胡兰”——张小娇就是典型代表。张小娇，仙居秧田村人。上世纪30年代，红军挺进师一部分成员活动到秧田、东坞一带，领导人张文碧与李炳贵、张小娇夫妇常来常往，夫妻俩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张小娇夫妻共同帮助红军战士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党“清剿”时，张小娇面对敌人的屠刀，毅然不顾自身安危，决不透露红军的秘密，最后她和她未出生的孩子倒在血泊中，年仅32岁。仙居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始终高涨，整村都参加革命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横溪的新罗村，上张的滕庄村，湫山的叶岩头村、方宅村等，这些村庄在革命时期成为一个个“红色堡垒”，为革命的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新时代如何坚持并发扬好“台州式的硬气”和“黄泥墙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②。仙居作为革命老区县，红色资源丰富，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鲜活素材。回望千年历程，“台州式的

^① 仙居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仙居简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22页

^②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

硬气”和“黄泥墙精神”是仙居历史上两个鲜明的地域文化瑰宝和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并发扬光大。我们要扎扎实实把优秀地域文化研究好、继承好，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一是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台州式的硬气”和“黄泥墙精神”中都强调了对理想信念始终不渝的追求和坚守。在仙居古代先贤的心中，理想信念是为国尽忠、福泽乡里；在革命时期共产党英烈心中，理想信念是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要始终坚守的理想信念，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引领。我们要以党史学习为契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仙居绿色跨越发展凝聚最广泛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二是要不断激发昂扬斗志。在仙居的千年发展史和革命斗争史中，仙居人那种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品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发扬。仙居是浙江26个需要加快发展的山区县。当前，省委把山区县跨越式发展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要以山区县跨越式发展，为全省发展注入新的更大增量。面对开启跨越新篇的时代使命，面对“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区

域竞争压力，我们更要从千年县史和百年党史学习中树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理念，自觉以“归零”心态、“赶考”状态和奋斗姿态，接好“接力棒”，走好新征程，努力争创山区跨越式发展的样板。

三是要加快推进共同富裕。不论是古代的先贤还是革命先烈，他们都心系百姓疾苦。我们不能忘记牺牲在仙居大地上的革命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仙居贫苦百姓能够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后，我们的工作重心要更多地朝着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去努力。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提出要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对仙居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仙居这样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而言，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改善民生工作尤其是城乡均衡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高山移民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启动移民安置，以此推进“二次城市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同时，要以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为契机，进一步探索走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推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作者单位：仙居县委党校）

台州市庆祝建党百年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暨“百年初心·幸福台州”大型网络传播活动启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浓墨重彩推进建党100周年网上主题宣传，4月21日，由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和中共台州市委网信办主办，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承办的台州市庆祝建党百年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暨“百年初心·幸福台州”大型网络传播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包括“百年初心·幸福台州”

大型网络传播活动、“我心向党”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寻访“红色根脉”主题实践活动、“党史微课堂”全媒体音频传播活动等在内的20余项网络主题宣传，讲好台州奋斗故事，讲好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台州实践、台州样本，宣扬台州垦荒精神，在台州这片红色热土上展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光辉形象。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学党史·践初心·担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



为加强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6月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欠梅带领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赴天台县蓝田村开展“学党史·践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上午，全体党员干部统一佩戴党员徽章，来到位于蓝田村的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会议会址。党员们认真观摩陈列在会址内的相关历史图片、文字史料，细致聆听解说员讲述1928年中共浙南特委在蓝田村成立的曲折经过，以及1930年杨敬燮等革命先烈领导农民武装发动桐柏暴动，与反动派开展一系列斗争的光辉历程。参观过程中，大家都被革命先烈们坚定信仰、无畏牺牲、不屈斗争的红色精神所感动，也深刻体会到了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



参观会址的同时，按照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专题实践活动部署，李欠梅主任同支部党员一起，积极为该处会议旧址的改造提升建言献策。大家围绕资料征集、史料审核、展区划分、布展格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

活动中，全体党员还进行了集体宣

誓。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党员，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此后，机关支部还组织党员参观了桐柏暴动重要发生地桐柏宫，并组织参观天台县博物馆、天台和合文化园等，进一步感受台州传统和合文化的熏陶。

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时刻牢记党员身份，持续砥砺党员初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担当作为，努力发挥史志部门职能作用，在“重要窗口”建设中不断贡献史志力量。

（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椒江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

5月17日，由椒江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白云街道联合举办的“建党百年 红色传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椒江区档案馆顺利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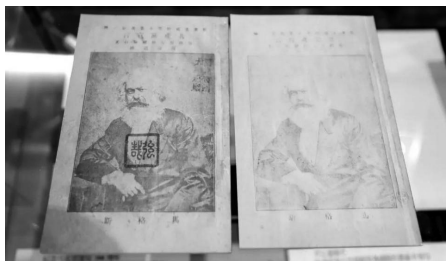
本次展览藏品涵盖世界各国及我国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版本《共产党宣言》、反映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重大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和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大陈岛垦荒等椒江重要历史节点的书籍、像章、报纸等共400余件，展示了建党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展品时间跨度极大，《共产党宣言》外文版最早版

本可追溯到1918年。

一场展览就是一段历史，一件藏品就是一段文化。这些红色藏品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革命前辈浴血奋斗、顽强拼搏的历史，是最直观、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展览全貌



《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

《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正式出版，至今已有173年。传到中国的时候是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翻译。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国家专门出版了100周年的纪念版。莫斯科印发了中文翻译版，当时在国外印刷中文版书籍十分少见，保存至今也弥足珍贵。



1973年德文微型版《共产党宣言》

该本《共产党宣言》尺寸为5.4cm*4cm,为微型版《共产党宣言》。



1970年1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在展的86个版本中，1970年1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最大的版面。该书印刷清晰，在当时用作市(地区)级以上干部、地方军区官员等高级干部党校学习材料。



2011年12月中华书局汉译纪念版

该本《共产党宣言》内附有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徐冰、陈瘦石、博古、乔冠华等六种译本及苏联外文局“百周年纪念版”等7种版本。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放撰写序言。

展览至7月底结束。

(椒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三门县建立“党史夜校”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新载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门县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学以致用，积极探索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建立“党史夜校”，推行“三个三”学习模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深走实。

念好“三字诀”，激发学习热情。一是念好“先”字诀，明确周一夜为夜校学习时间，领导干部学在前，做在先，带头参加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指导分管领域、部门单位和联系村的学习教育，形成上行下效、层层带动的学习氛围。二是念好“严”字诀，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严肃党史夜校学习纪律。由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排学习主题，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为“党史夜校”提供纪律保障、组织保障，确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形成一级抓一级的学习机制，确保“党史夜校”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念好“实”字诀，编印党史夜校学习资料，明确已经编印了5课，建立考勤、通报、考评等制度，要求党员干部学习时要结合所思所悟，圈重点、写标记、做批注，做到“每周一学、每月一述、半年一评、全年一考”，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县纪委监委对各党组织开展“党史夜校”情况进行定期抽查并予以通报，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紧扣“三个学”，丰富学习形式。一是规定精学，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周一上午印发本周规定必须学习的主题、书目和章节，全县党员干部按照“原原本本学”的要求，静下来、坐下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目前已发布学习主题6期。二是论坛亮学，通过观看讲座视频、邀请专家辅导、交流发言、演讲比赛、知识竞答等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特别是把青年党员、青年干部推上讲坛，让他们结合工作谈认识、讲体会，为三门青年快速成长提供舞台。如团县委的青年大学习论坛累计有28名青年党员干部走上讲坛，结合工作谈认识、讲体会。三是宣讲活学，开展“千场党史宣讲进支部”活动，组织青年党员、老党员、先进典型结合行业职能职责、结合当地发展、结合自身经历在本单位党支部或基层党支部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目前，全县共成立宣讲团21个，分批次走进全县1000余个党支部，用方言故事、三句半、微党课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开展宣讲。

打造“三堂课”，促进学用相长。一是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打造“红色课堂”。深入挖掘“浙江红旗第一飘”丰富的本地党史素材，依托亭旁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城西初心馆等核心地标，以全县革命遗址、红色（下转第52页）